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目錄

《SARS 專號》

SARS 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展望

- 飯島涉

SARS 與社會輿論反應的研究

- 中山大學人類學課題組

香港道教送瘟祈福法會及其辟瘟經文

- 游子安

澳門的疫症與廟宇

- 陳國成

有關 1932 年廣州霍亂疫症的報章資料介紹

- 潘淑華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香港歷史檔案館館藏照片介紹

- 香港歷史檔案館

活動消息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啟事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為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文稿中請勿出現任何顯示作者身份之文字。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300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5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為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5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為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子郵件：hsslzw@zsu.edu.cn
電話：86-20-84110305
傳真：86-20-84113308

《SARS 專號》

編者語

自本年年初開始，由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統感染在世界上多個地方蔓延。由於最初缺乏有關引發該疾病的病毒資料，故一般稱該疾病為「非典型肺炎」；及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正式命名其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SARS。該病毒的傳染能力頗強，廣東、北京、香港、台灣、星加坡、越南和加拿大等地相繼在短時間內感染該病毒的人數激增，各地的政府和人民皆對該新疾病產生很大的恐懼和關注。

在治療此疾病的過程中，各種力量不斷重塑國際關係、族群形象、社區組織、權力結構和文化傳承等各方面。雖然該疾病現時已受到控制，但上述各方面的轉變正日漸明顯。本通訊在哀悼不幸者之餘，更希望可以記錄這項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特設 SARS 專號，以供研究者和讀者探討和反思。雖然該疾病正確的名稱為 SARS，但「非典型肺炎」一詞已普遍被人們所接受，所以，本專號中上述兩項名稱皆通用。

各篇文章來自不同的地區，報導了當地對「非典型肺炎」的反應。研究文獻在建構過程中，本身也成為了歷史資料的一部份。各篇文章所關注的問題、其探討的角度，以及其所表達的意見，也將成為了我們了解各地對此次疫症反應的研究資料。

SARS 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展望

飯島涉

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

一、前言

自去年秋天到本稿執筆為止，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廣東省、香港、新加坡、北京、多倫多、越南，以至台灣等地肆虐，造成很多問題。本文嘗試從傳染病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角度出發，探索傳染病對社會的影響。

也許可以說是幸運，迄今為止，日本並沒有感染 SARS 的病人。因此，對於生活在橫濱的筆者來說，除了原定在香港和上海舉行的會議被取消外，SARS 並沒有構成任何實質的影響。雖然如此，筆者每天透過日本的報章、電視、電台等傳媒的報導，追蹤各地有關 SARS 的狀況。在 5 月

初，一位染病的台灣醫生到日本旅行的消息披露後，有關 SARS 的報導達到頂點。就如後述一樣，日本社會對 SARS 的反應，不單是過份的，而且，還牽涉到人權、國際貢獻等問題。在日本的華僑華人社會也有各種各樣相應的活動。本稿的另一個目的，是記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對 SARS 的對應。

對研究中國乃至東亞社會的傳染病歷史的筆者來說，環繞著有關 SARS 的諸種狀況仍然是非常複雜的。有些狀況是在歷史上存在的，有些是嶄新的。筆者通過電子網絡追蹤 SARS 發展的狀況。在 SARS 蔓延的時候，有關傳染病的資訊的

提供和交換，通過跨越國界的電子網絡頻繁地流通。這可以說是探討傳染病的一種嶄新的方向。一方面，控制 SARS 的研究網絡的形成和情報互通的機制的發展；另一方面，個人可以通過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各國政府的官方網頁，即時地取得有關 SARS 的資訊和他們的對策。對疾病研究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世界衛生組織批評中國政府對 SARS 的漠視是延誤及早防禦 SARS 的主要因素。可是，現在中國中央政府、上海等地方政府，以至台灣政府的網頁都積極地提供 SARS 的資訊。無疑，資訊的公開緩和了批評和焦慮。此一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中文網站的普及和政府資訊電子化的結果。又如台灣政府透過視像電話監察家居隔離者的方法，是近年發展起來的對 SARS 等新的傳染病的監察系統。可以說是，這是一種「近未來」的狀況。這樣的發展在日本還是未能有效地實行。假如日本有 SARS 的染病者，日本的中央以至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如此有效地同步地提供資訊？

現在，SARS 的疫情逐漸受到控制，新病患者也逐漸減少。可是，從多倫多在疫區名單中剔除後，再有感染個案出現的情況來看，對 SARS 的控制仍未能完全樂觀。在 SARS 蔓延期間，由於這是新的傳染病，加上其傳染路徑不明，沒有有效的疫苗等因素，「緊急避難」成為受人重視的對策。也許在這裡我們可以窺見在二十一世紀對傳染病的對策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從各式各樣的角度來反覆地探討這些問題，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二、歷史中的傳染病

SARS 蔓延時，很多人都憂慮這是二十世紀初在全球爆發的流行性感冒的翻版。因為二者皆是呼吸系統的傳染病。假如憂慮成為事實，世界便會陷於大混亂。在 1918 至 1920 年流行性感冒爆發期間，全球有 2,500 萬人因感染而去世。當時流感在香港和台灣亦有相當程度的擴散。雖然我們對中國當時流感擴散的狀況並不太清楚，也沒有發現其對人口有大規模的影響，可是在都市和部

份的農村應有相當的蔓延。筆者認為，從傳染的途徑以至對社會制度和意識的影響方面來說，約一百年前發生的鼠疫較流行性感冒更為深遠。

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當時由於相繼發現導致傳染病的病原菌以及帶菌媒體的生物，以及世界各地的學者紛紛來港展開研究，令到這個時期成為傳染病研究的黃金時代。當時研究結果指出，鼠疫的出現是由於吸血的跳蚤把鼠疫菌傳送到人體內。故此，當時的對策是積極地強制隔離病患者以及清潔環境，杜絕老鼠等帶有跳蚤的小動物。可以說，當代人對傳染病的對策，是根源自應付十九世紀初各地爆發的霍亂和鼠疫所累積下來的經驗而確立的。

在香港擴散的鼠疫來自雲南。十九世紀中的回亂以及中國生產的鴉片的貿易促成十九世紀後半期鼠疫在廣東省各地廣泛傳播。1894 年鼠疫由廣州傳到香港，令到很多華工染病和死亡。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1894 年有 2,700 人染病，他們大部份不能痊癒。1894 年後，鼠疫仍然不斷在香港出現。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鼠疫由香港傳到上海、天津等中國沿海地域，繼而向東傳到臺灣、日本、夏威夷和北美洲，向南經過新加坡、東南亞、印度傳到南非。這樣的鼠疫全球化的背景，是殖民主義全盛時期，聯繫世界各地的交通網絡體系化的結果。鼠疫因為人的移動而活躍起來。因此，鼠疫的廣泛傳播可以說是一百多年前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結果。當時，鼠疫在臺灣被稱為「香港病」。這是由於臺灣的鼠疫源頭是來自香港的勞工或避難者。雖然用地名作為疾病的名稱，在世界各地皆然，然而此一事例可以反映當時人的意識中，鼠疫這種傳染病和地域的密切關係。

傳染病的擴散導致很多人感染和死亡，也隱含著強烈的社會及政治意義。全球爆發的鼠疫由於是源自香港，所以世界各地也以防治鼠疫為理由，推行排華運動。東南亞和北美的唐人街更為其標的。1899 年 12 月夏威夷檀香山發現有人感染鼠疫後，實施交通中斷，燒毀感染者的房屋，感染者在收容所隔離等措施。1900 年 1 月，因為燒

毀感染者的房屋引至唐人街大火。這次大火被稱為「夏威夷黑死病事件」。事件的真相迄今仍有很多未能解明的地方。有些傳聞認為這次事件是縱火而非意外失火。當時有很多日本人在唐人街居住，因此，排華運動很快衍生為排斥亞洲人的運動。有認為「夏威夷黑死病事件」是對在檀香山擁有強大經濟勢力的華人和日本人的一種打擊方法。當時，檀香山的華僑希望透過清政府向美國政府追討賠償由火災所引致的損失。賠償交涉事件雖然未能完全反映華僑社會的利害關係，然而，這次事件可以說是傳染病問題所引發的國際政治問題。

鼠疫全球化的結果，對各地產生很大影響。鼠疫在印度的傳播對該國的人口結構有很大影響。在南非，1901年開普敦出現了鼠疫患者，南非政府藉此實行對非洲人隔離。這一措施是後來施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的背景。

傳染病史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在種族主義背景下，傳染病的傳播和排斥的問題。在歷史上，這樣的問題不勝枚舉。而且，它們也不是過去才有的問題，這從 SARS 發生後各地的對應，也可窺見。不少國家以防止 SARS 蔓延為原因，停止辦理入境護照，限制中國人入境。當然，現在的狀況和一百年前鼠疫流行時的狀況並不能百分百等同。用種族、國籍作為理由而實行差別待遇，很容易成為批判的對象。可是，在本年 5 月，當一位感染 SARS 的台灣醫生在關西地方旅行的消息公佈後，各地的酒店、都拒絕臺灣人以至中國人住宿。雖然這些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行為，但在社會和政治上卻並沒有引發任何的問題。與此有關的是日本記者在臺北的記者招待會上發問的不恰當問題，導致臺、日的關係一度惡化。日本在沒有 SARS 患者的情況下，仍然有這樣的種族主義色彩的反應，假如日本真的有人因此感染 SARS，後果如何，實在難以想像。

在歷史上，天花、霍亂、流行性感冒等都是影響人口的傳染病。可是，除了印度以外，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擴散的鼠疫，對人口結構並沒有產生很嚴重的影響。即使如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人口結構也沒有因為鼠疫而產生很大

的變動。可是，鼠疫的傳播和全球化，無疑對各地的社會制度以及社會規範產生影響。在中國，鼠疫的契機，喚起了「衛生民族主義」。為了對抗在「夏威夷黑死病事件」中隱含的排華運動，中國政府積極推行衛生運動，將衛生事業制度化，實行傳染病對策，從而確立對外的地位。在鼠疫全球化的時候，外國政府直接介入中國的衛生行政。這包括基督教派遣醫療傳道使節，在中國設立醫科大學，以至通過租界，直接地介入中國的衛生行政。為了對抗外國政府的介入，引入近代衛生行政制度成為中國政府一個重要課題。可是，事實上，中國政府遇到了不少困難。近代衛生行政的推動，並不能單靠引入西方醫學。對付傳染病不能只是依賴技術，政府必須介入個人的生活領域，重新整理社會制度。

1930 年代以後，在戰爭的陰霾下，中國衛生行政有長足的發展。國民政府推出「衛生救國」的口號，進行抗日戰爭。同時，也抵抗以 731 部隊為首的日本軍隊所發動的細菌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在 1950 年代推行「愛國衛生運動」。面對著和美國的戰爭，衛生事業成為中國政府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共產黨通過這一運動，把統治權力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朝鮮戰爭時，認識到美軍可能會發動細菌戰。因此，「愛國衛生運動」此一政治運動的原動力，無疑是一種衛生民族主義。

二十世紀，中國的衛生行政機構在戰爭的影響下，推行傳染病對策、並且成功地控制傳染病的傳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疾病結構在中國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日常生活中導致死亡的傳染病，主要是痢疾、傷寒、霍亂、肺結核等。1950 年代以降，傳染病在中國受到控制的原因包括：(1)制度化的社會，透過都市的工廠和國營企業以及農村的人民公社等獨特單位，有效地管理著個人的行為。(2)對教育和醫療的大量投資，(3)1950 年代以後，中國社會與外國沒有密切的交往。

三、日本的華僑華人社會的對應

在歷史上，從「夏威夷黑死病事件」可見鼠

疫由廣東省開始向全球傳播，對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社會影響至深。然而，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社會對這次的 SARS 疫症究竟如何對應？下文嘗試介紹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對應，以供參考：

本年 4 月下旬，當中國政府將北京的感染人數大幅上調之後，日本華僑華人社會與日本社會才開始對 SARS 有實質的對應行動。下文主要根據《日本僑報電子週刊》，介紹他們對 SARS 的對策和反應。

4 月 28 日，(日本)中華總商會開始敦促會員注意防範 SARS。他們利用電話、電郵和互聯網互通資訊和消息。互聯網在資訊互換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¹同時，中國大使館科學技術處呼籲在日本居住的中國人共同協力對付 SARS，要求提供有關 SARS 的醫療(包括診斷方法、醫護人員的防護措施以及醫療器具等)、傳染病學及公共衛生有關的資訊。²中國大使館也為在日的中國人提供和 SARS 有關的中文資料。³

日本的新華僑團體對 SARS 的傳播尤其敏感。例如日本華人教授會議呼籲收集有關 SARS 的情報、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寄贈醫療用口罩予中國的醫療機構。⁴此外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聯盟理事會應中國大使館的邀請，向在日本居住的醫護人員提供有關 SARS 的資訊。⁵

除了以知識分子組成的專業團體為主的新華僑團體外，如天津同鄉會、四川同鄉會、山西同鄉會等同鄉團體亦積極募捐金錢和物資。⁶

到了 5 月 25 日，由日本中華總商會主辦、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連盟、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日本企業中國投資促進會、日本華僑華人學會、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會、在日華人教授會議、全日本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神戶華僑總會、北京大學校友會、山西同鄉會等團體協辦的慈善音樂會在東京舉行。⁷這次音樂會共籌得 650 萬日元的善款。⁸

以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連盟、全日本中國人博士協會、日本華人教授會議、日本中華總商會、中國留日同學會、西日本新華僑華人聯合會、在日中國辯護士(律師)聯合會為主幹的新華人團體日本新華僑華人會準備委員會，也去信中

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祈求 SARS 疫症平息，並且表示積極支持抗炎。⁹

如上所見，在日本的新華僑團體，通過互聯網交換資訊，從而敏銳地對 SARS 作出快捷的對應。

雖然如此，橫濱中華街也受到 SARS 相當的影響。橫濱華僑總會會長曾德深指出，受到謠言影響，很多預訂了的饗會因此而取消。在所謂「風評被害」(受謠言所影響)的時候，橫濱中華街主辦了與衛生有關的學習會，並且延遲華人廚師請假回國的申請。換言之，他們用積極的資訊公開的方法，對付「風評被害」的影響。¹⁰

四、SARS 的教訓

1970 年代，人們相信傳染病是可以撲滅的。到了今天，無論從藥物的效力和傳染病本身，我們認識到傳染病是很難完全撲滅的。舉例來說，在今天，每年死於瘧疾的人就有一百萬以上。是繼愛滋病(HIV)和肺結核之後，導致死亡人數最高的傳染病。二次大戰後，人們認為大量使用 DDT(雙對氯苯三氯乙烷)便可以撲滅瘧疾。可是，不但使用 DDT 產生很多問題，DDT 藥力的有效性也出現問題。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對瘧疾的對付方法，便不得不由撲滅方案下調為控制方案。在今天，由於憂慮地球溫度日高、瘧疾傳播的範圍擴大，瘧疾對策成為高峰會議必然的重要議題。

愛滋病和依波拉病毒是人類因為開發森林改變生態環境的行為而引發的新傳染病。SARS 也是這類新傳染病。對於這些新傳染病的出現和那些已受控制的傳染病再次爆發的可能現象，細菌學家吉川昌之介稱之為「細菌的反擊」，醫學史家酒井シズ也警告說二十一世紀是「傳染病的時代」。他們預測這些傳染病因為開發森林而發生。雖然我們知道必須盡量減少因為人類的社會活動而帶給大自然的傷害。然而，事實上，我們卻很少做到。

1970 年代末，中國的政策改變，經濟成長被置於發展的首要位置。因此，假如因為 SARS 而令到人和物的流動停滯不前的話，就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很大影響。故此，環境和社會體制伴隨著

經濟成長而產生很大變化。對在二十一世紀初發生的 SARS 的對策，目前主要是用緊急避難的方法。可預見的是 SARS 對策的發展會對社會制度帶來重大影響。傳染病對策是一種公共衛生政策，是社會體制中重要的一環。隨著人民公社解體、私營企業興起以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等發展，中國的社會體制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有很大的改變。可是，在政策轉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不足等問題，發現社會體制如何地重整，仍然有很多不明之處。

中國政府在各地組織推行 SARS 對策的機構，在執行對病患者的醫治和隔離外，同時加強下列工作：對人口流動的監控、將與 SARS 有關的知識普及化、投入很大的資金予低收入家庭和年長患者、管理藥物的市場價格、取締藉 SARS 的投機、禁止到廟宇參拜和取締藉 SARS 之名作出的違法行為。我們不知道這些政策究竟如何有效地收拾和整理現在的情況。但是，作為社會政策一環的公共衛生行政，無疑因為推行傳染病對策而令到社會體制有很大的改變。舉例來說，根據〈上海市預防和控制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預案(試行)〉，在法律方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執行〈傳染病防治法〉及其細則，並且由衛生局落實技術方面的對策、公安局則著實執行交通和隔離等強制措施。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各種醫療機構和在居民社區中設立的衛生中心的功能。〈傳染病防治法〉在 1989 年修訂，其中第 24 條指出病患者及其家屬成員所屬的單位以至居民、村民組織是具體執行醫療衛生的機構。當 SARS 流行時，上海市對社區組織寄予相當期待。這種對社區的期待，反映出社會體制的變化。也就是說社會事務由管理嚴格的居民委員會以至國營企業等單位轉到居民組織的地域社區裡。SARS 對策強調的是個人的管理。因此，今後地方管治方法的比重，也許會向這方面作出體制上的修正。此外，在農村方面，隨著人民公社解體，對個人的管理逐漸鬆弛。人民公社解體令到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的功能喪失。因此，假如 SARS 在農村蔓延，對農村的影響，將會是難以想象。SARS 的傳播，也許是中國政府整頓因為政策轉變而導致管理體制鬆弛

的重要契機。

此外，SARS 的各種問題當中，有著眾所周知的臺灣不能加盟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國際衛生事務的運作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基於這個理由，中國一向反對臺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子。對於支持臺灣加盟世界衛生組織的日本衛生勞動相(衛生相)坂口的言論，中國政府的反應非常敏感，要求日本政府貫徹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可是，6 月中旬世界衛生組織在吉隆坡舉辦的 SARS 專家小組會議，准許臺灣的代表參加。這樣的變通方法，在今後的重要衛生問題上也許會繼續採用。

與 SARS 有關的國際關係方面的活動，有 4 月下旬在吉隆坡舉行的東盟及日本、中國、香港、韓國衛生長官的緊急會議，和在曼谷舉行的東盟和中國的首腦會議。中國總理溫家寶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皆有出席在曼谷舉行的會議。曼谷峰會一方面採用吉隆坡會議的對策，中國和東盟國家同意設立傳染病對策基金、建設治療和研究的資訊網絡和設立緊急通報機制。無疑地，SARS 對策是具備政治性的。日本政府從國立國際醫療中心的專家中派遣醫療援助隊到中國，並且提供醫療器材等物資。在橋本首相時代已積極提倡日本在傳染病對策上的國際角色，可是，即使如此，日本對抗 SARS 的國際貢獻仍然不足。這一點從與世界衛生組織主頁連線的研究機構中，沒有一個是日本的網址的這個事實可以略窺一二。日本只是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神戶中心的活動，在國際醫療方面稍稍做出貢獻。

五、結語

非常遺憾地，二十一世紀以「911 事件」、美國主導發動的戰爭以及 SARS 揭開它的序幕。就如恐怖主義的對策一樣，對付傳染病，最終必然是個人管理的問題。對於 SARS 本身來說，疫苗會在短期內研究開發成功；病房內交叉感染的情況，也應該可以改善。可是，從 SARS 帶出的社會問題方面來看，現在推行的對策極其量是管理主義的方向。這從各地實施體溫檢查這一點可以看到。雖然這是管理技術提高的問題，但是，毫

無疑問地，政治借傳染病對策介入個人的生活領域中。在 SARS 衝擊時選擇的緊急避難的對策告一段落時，我們便需要重新考慮社會制度問題。

SARS 的研究，因為研究者透過互聯網共享資訊而得到長足進展。從而，傳染病對策的國際組織也很可能因此而改變。這從世界衛生組織選擇積極干預的路線，可見端倪。雖然這是否意味著世界衛生組織會選擇無視各地政府的意向，強

行進行調查這一體制，還是極具爭議的。然而，現在很可能已經進入了國際機構是否應該介入各地域的事務的爭議階段。

二十一世紀的衛生組織在 SARS 的衝擊中，開始了它的摸索階段。在這裡，應該討論的不單止是醫學和衛生學的問題，還有國際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課題。

註釋：

- ¹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1 號，2003 年 4 月 30 日。
- ²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2 號，2003 年 5 月 7 日。
- ³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2003 年 5 月 14 日。
- ⁴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2 號，2003 年 5 月 7 日。
- ⁵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2003 年 5 月 14 日。
- ⁶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4 號，2003 年 5 月 14 日；第 310 號，2003 年 6 月 4 日。
- ⁷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6 號，2003 年 5 月 21 日。
- ⁸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08 號，2003 年 5 月 28 日。
- ⁹ 《日本僑報電子週刊》，第 312 號，2003 年 6 月 11 日。
- ¹⁰ 《每日新聞》，2003 年 6 月 19 日。

參考文獻：

- 吉川昌之介，《細菌の逆襲》，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 酒井シズ編，《疫病の時代》，東京都：大修館，1999。
- 飯島涉，〈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飯島涉編著，《華僑、華人史研究の現在》，東京：汲古書院，1999。
- 飯島涉〈ベストと近代中國衛生の「制度化」と社會變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
- 市雅俊、齋藤修、脇村孝平、飯島涉編，《疾病、開發、帝國醫療アヅアにおける病氣と歴史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 Iijima, Wataru. "Spanish Influenza in China, 1918-1920," in David Killingray and Howard Phillips, eds. *Spanish Flu*. London: Routledge, 2003.

SARS 與社會輿論反應的研究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課題組¹

突發事件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反應。SARS 事件以來，民眾對這一現象的廣泛議論匯集成社會輿論，在原有的社會文化基礎、疫情變化、政府措施、媒體引導四者的綜合影響下，社會輿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本文在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的基礎上，結合文獻資料，分析了社會輿論的形成過程、特點和影響，探討社會輿論所反映的集體表像，提出了引導社會輿論的短期對策和長遠建議。

一、研究的目的、意義和方法

作為社會文化動物，人類對周圍事物賦予了社會文化意義。突發事件極易打破社會原有的平衡，引起人們在言論、心理和行為上的反應，形成特定的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SARS（即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的簡稱，意為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我國稱為非典型性肺炎，在本報告中 SARS 與非典通用）在廣東被發現後，各種與 SARS 相關的消息經過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徑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在社會輿論層面出現了「致命病毒」、「米荒糧荒」、「人瘟」等一系列核心的辭彙和因此而導致的核心事件。尤其是北京出現疫情以後，5月3日到5月6日蔓延全國達14個省的「啞巴說話」事件²，是民眾的恐慌心理在社會輿論層面上的充分反應，也是集體無意識的彰顯。

社會輿論與搶購風、大學生和民工返鄉、求神拜佛等相輔相成，構成了全國各地類似的「SARS 現象」。諸如此類問題以及北京和部分地區的「SARS(非典)恐懼綜合症」，使 SARS 現象迅速從一個醫學問題上升到社會問題。SARS 現象折射出了轉型時期我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傳統文化中「集體表像」(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殘餘，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力圖綜合多學科視角，通過對文獻資料、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資料的解讀，結合個體

在輿論場中的反應模式，綜合分析在原有的社會文化基礎、疫情變化、政府措施、媒體引導等變數影響下社會輿論的幾個階段、特徵和影響，同時指出社會輿論的地區差別。在訊息高度發達的社會，社會輿論的爆發力和影響力比以往更加突出，引導社會輿論的手段方式和力度也空前加強。把握社會輿論的規律，進行全方位的合理引導是現階段的當務之急，而從長遠來看，建立健全的輿論制度，進行全民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提高，培養民眾的判斷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是減少引爆式社會輿論發生的有效途徑。

二、SARS 事件中的社會輿論過程、作用

1、社會輿論和謠言的界定

關於社會輿論，古今中外有多種定義，有「賢人意見說」、「群眾意見說」、「意見總和說」和「多數意見說」等等，³各有優缺點。無論怎樣歸納，社會輿論的核心內涵是一定的，即它是大眾的看法和意見。課題組在綜合多家觀點的基礎上，將社會輿論定義為一定社會群體內相當數量的成員對於社會現象所發表的非官方的並形成一定規模的議論，主要研究政府及媒體以外的民眾輿論。

社會輿論是一種客觀的社會意識現象。它由社會存在決定，並反映社會存在，與其他社會意識形式相比，它更即時、更迅速、更直接、更強烈也更複雜多樣。

社會輿論反映社會有多種形式，以真實性而言，有諍言（忠實之言）、傳言、謠言；以表現而言，有意識輿論、體態輿論；以進步性而言，有正向輿論和負向輿論；以表達方式而言，有敘事類、議論類、歌謠類等等。值得討論的是對於謠言的定義和運用。

謠言是社會輿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劉建明認為：「謠言作為輿論出現，是眾人傳播虛假事實的行為。」「謠言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事實描述，

無根之言」。⁴ 謠言是貶義詞。這無疑也是現代一般人的理解。不可否認，謠言的形成有以下一種情況，即某些人出於惡意，捏造事實，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這是不是謠言的完整定義呢？或者說，是不是我們稱之為謠言的東西都是無根之言、虛假的事實？

我們來看看 SARS 出現以後，廣州媒體所稱的「謠言」：

2002年12月15日，紫金縣的黃可初和郭杜程先後住進了河源市人民醫院……其症狀是咳嗽、發燒，肺部有陰影，懷疑感染不明細菌……不久隨著病情發展，兩名患者分別轉入深圳福田醫院和廣州陸軍總醫院。兩人轉院後，曾經接診過他們的5名醫務人員先後出現與患者相同的症狀。於是，謠言隨之誕生。記者所能搜集到的最早的版本是這樣的：河源受一種不明病毒襲擊，已有1人死於此症，醫護人員亦同時患上此病。

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得悉此事後，於1月3日凌晨1時緊急給《河源報》傳真發表聲明，請市民不要聽信謠言，河源沒發生甚麼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亂服藥，並分析指出，那些天河源天氣較寒冷，可能正是這樣才使一些人產生了類似咳嗽、發燒等症狀。河源恐慌引起廣州市媒體的關注，各家報社都派記者到河源實地採訪。從1月3日起，各家報社都刊登了河源出現謠言的消息。

1月8日，由廣東省衛生廳、廣東省藥監局等部門共同舉辦的「健康送萬家」公益巡迴活動抵達河源，向河源市民贈送了價值10萬元的抗病毒口服液。河源市衛生部門表示，這批抗病毒口服液將免費贈給感冒患者。並再次澄清：此前有關「河源出現未明病毒」的傳言純屬謠傳，只是由於近期

粵北地區天氣寒冷，感冒、肺炎患者有所增加。⁵

當我們今天來回顧這段剛剛過去的歷史時，不得不承認，無論是河源的關謠還是廣州2月12日《南方都市報》的〈謠言調查〉和關謠，所指的謠言都不是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的虛妄之言。民間傳言中的「不明病毒」和「醫務人員受感染」等內容現在看來高度真實，反倒是官方和媒體的關謠顯得蒼白滑稽。政府想穩定民心、怕社會出現恐慌和騷亂，初衷是好的，但完全可以用實事求是「不說謊」的方式來處理。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批駁了以「無根據」和「未經證實」作為謠言的定義，他精闢地指出，謠言之所以令人尷尬就是因為它可能是真實的，並不總是無稽之談。他認為應該這樣表述：「我們稱之為謠言的，是社會中出現並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所關謠的訊息。」因而，「謠言是對當局的一份報告。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當局開口說話。」⁶若以這個定義來審視2月12日媒體所關的「謠言」，可謂十分貼切精闢。

「謠言」一詞原本是一個以民為本位的詞。從詞源學角度來看，謠，本義是不用樂器伴奏的歌唱，即現在所謂清唱也。《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毛傳》：「曲和樂曰歌，徒歌曰謠。」而「謠言」一詞的本義是指民間流行的歌謠或諺語。後來，謠言的詞義色彩發生了變化，多用於從統治者立場出發對民間傳聞的一種偏見和蔑稱。我們可從史書上見到許多這類對民間傳言的描述，多以「妖言惑眾」來定性。

本文追溯「謠言」的最初含義並非是號召回歸其本義，漢語史上，詞義的演變本來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筆者的初衷是想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勿輕易給百姓的輿論扣上「謠言」的帽子。本文遵從現代民眾的思維習慣，將虛妄、以訛傳訛、無從證實之言視為謠言或流言，而將民眾之間交流的關於 SARS 的真假攙雜的訊息用中性詞傳聞或傳言來概括。

2、SARS 中社會輿論的階段分析

在 SARS 事件中，社會輿論是 SARS 這一突發事件誘發產生的，我們根據 SARS 產生發展的過程以及社會輿論反映的特點，將 SARS 中的社會輿論分為四個階段。

(1) 200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3 年 2 月 10 日，SARS 初現，如星星點火，官方及大眾傳媒沈默無言，社會輿論以「傳聞」的形式迅速蔓延，並形成一個高潮，進而轉化為搶購行為。⁷

2002 年 11 月 16 日，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接診了一例特殊肺炎患者。事後推測，這就是廣東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而民間傳言的興起是在一個月後的粵北小城河源。12 月 15 日入住河源人民醫院的兩位病人傳染了 5 名醫務人員之後，有關「不明病菌」的傳言開始在當地流動蔓延並產生恐慌，搶購藥品成風。緊接著，中山市出現了更兇險的疫情，中山市中醫院呼吸科先後收治了 12 個「不明原因性肺炎」病人，他們傳染了七八個醫務人員。隨即在當地引起社會傳聞、恐慌和藥品搶購。

很快，隨著 SARS 進入廣州，民間傳聞蔓延達到了高峰。2003 年春節前後，廣東非典型肺炎進入發病高峰，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廣州，相當一部分是接診的醫務人員。

由於非典型肺炎是一種新型疾病，要查明病因，弄清楚其危害性尚需要時間，如何引導社會輿論，各方意見不一，因此媒體沒有立即對「非典」展開報導。官方媒體的沈默，客觀上促成非正式傳播渠道活躍：傳聞鋪天蓋地，人心極度恐慌。

所謂「非正式渠道」，在傳播學語境中，指的是官方組織傳播及大眾傳媒以外的訊息渠道，主要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傳播。在過去主要通過直接的口耳相傳，速度慢，範圍也有限。而現在，現代傳媒技術使得人際傳播大大突破了「耳語相傳」的局限，SARS 的各種傳言以驚人的速度向越來越大的範圍傳播。在這一過程中，口耳相授、電話、電子郵件、手機短訊息甚至 QQ 聊天——凡是人對人的傳播都不斷傳送、放大、甚至扭曲著病毒事件和恐慌心理。據 2 月 12 日《羊

城晚報》報導，市民有關非典型肺炎的消息八成是從手機訊息和網上獲得的。據廣東移動通訊的短訊息流量資料統計：2 月 8 日，4,000 萬條；9 日，4,100 萬條；10 日，4,500 萬條。廣東發達的訊息系統成為 SARS 事件中最主要的社會輿論工具。

下面是一個 SARS 傳聞沿人際關係網絡散播的個案：

個案 1：Z 大學 T 某，女，碩士生。2 月 10 日下午，我返校後，收到兩條發自我的兩位高中同學的短訊息。這兩位同學分別在佛山和南海工作。一位同學的短訊息說：「近來有一種傳染病，可喝板藍根沖劑預防。」另一位同學的短訊息也是提醒我注意這種傳染病，他提供了一個中藥配方，並強調說：「消息可靠，不可不防。」當天晚上，我收到我弟弟的短訊，他比我早一天到廣州，他提醒我說廣州正流行一種傳染病，不要到人多的地方。第二天，我媽媽打電話給我，說這種病很厲害，提醒我要蒸醋消毒，並說佛山的醋漲到 30 元一瓶，她也買了一瓶這樣的高價醋。

因為沒有可控性，各種訊息魚龍混雜，衍生出多個謠言版本：禽流感或鼠疫引起、遭到生化武器襲擊、廣州有幾千人死亡、某醫院被戒嚴等等，其中病因、病情、死亡人數等越傳越恐怖。

大眾傳播學和社會心理學都有「集群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 這一概念，指的是在某種刺激條件下發生的一種非常態的社會集群現象。多以聚集、流言、恐慌、騷動的形態出現。集群行為發生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正常的社會傳播系統功能減弱，傳聞、流言等非常態的傳播機制活躍化。⁸ 可以說，傳聞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不協調的產物。

1953 年，克羅斯對艾爾波特和波茨曼提出的

一個關於傳聞的計算公式加以補充修正，提出以下公式：

$$R = i \times a \times c \quad (c \text{ 成反比})$$

其中，C= 批判能力 (critical ability)

克羅斯指出，群體或個人的批判能力越強，傳聞的流佈量越少。綜合看來，決定傳聞產生及其流佈量的直接要素有三：事實的重要程度，事實的模糊程度和公眾的批判能力。以此來分析，在 SARS 發展的初期（2 月 10 日以前），對 SARS 的無知，政府的無言，使得人們對生存環境產生較高的不確定感，而生死攸關，事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這是 SARS 傳聞風行的客觀條件；就公眾主觀的批判力而言，它其實是個體通過感覺、知覺、表像、概念、判斷、推理等環節達到的認知，是個體對訊息的接受或取捨過程，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一個訊息愈是能引起恐懼，那麼它在改變人的態度和行為方面便愈有力量。這個現象被稱為「恐懼喚醒」⁹。SARS 喚醒的是危及生命的恐懼，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因此大多數人理智下降，批判力減低。

不可否認，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的時候，群眾更重視權威性的訊息來源，最期待的是政府的聲音，渴望廣播電視和報紙上能夠給他們一個權威的說法。但是直到 2 月 10 日早上，才有當地媒體報導廣東省部分地區先後發生「非典」型性肺炎病例。但面對如此性命攸關並早已滿城風雨的重大事件，除《南方都市報》外，各大報紙只發了一條家家都一樣的四、五百字的通稿，廣東市民的心情可想而知。由於消息過於簡單，缺少感染人數、死亡人數等重要訊息，傳言伴隨著恐慌繼續彌散，終於演變為一場絕大多數家庭都捲入了的對板藍根、白醋、口罩的大規模搶購風潮，板藍根、白醋、消炎藥價格節節攀升。現代傳播手段的助動也使傳言和恐慌放大到全國。內地也出現了某些搶購藥品及藥品漲價的現象。我們所調查的河南許昌和重慶的同學都提到她們在寒假期間往廣東寄板藍根，從郵局工作人員口中，她們知道這種情況很普遍。

其實，搶購也是一種輿論形式，劉建明稱之為「體態輿論」或「行為輿論」，因為搶購這種集群行為是輿論支配的結果，也是輿論表達的一種方式。¹⁰ 訴諸行動的表達會帶來實質性的社會震蕩，某些單位或個人趁機哄抬物價，或利用大眾的盲從心理製造謠言促銷。整個城市社會趨於不穩。

(2) 2 月 11 日至 2 月 25 日：SARS 繼續蔓延，官方與媒體介入澄清，但流言依慣性發展；民眾心態稍穩，但對政府的懷疑多於信任。

2 月 11 日，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衛生廳先後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已發現 305 宗病例，死亡 5 例，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11 日、12 日，廣州各大報紙開始大篇幅報導，一時間，廣州媒體上有關非典型肺炎事件的新聞如洪水決堤，洶湧而來，鋪天蓋地。媒體的大規模介入緩解了已在市民中蔓延多日的恐慌，對藥品、板藍根、白醋、口罩的搶購潮於 11 日至 12 日基本平息。

流動狀態是輿論的重要特徵，一旦形成輿論狂潮，輿論便以巨大的慣性奔騰向前，決不可能說一經政府行文發佈，便會出現「盛極一時的謠言壽終正寢，處於謠言中近兩個月的社會趨向平靜」¹¹ 的局面。於是我們看到，在政府已經出面之後，鹽荒米荒的謠言又不知從何而起，在惶恐無措的廣東人民中又掀起了第二次搶購潮——搶購大米、油和食鹽！筆者在深圳從親友電話中得知搶購的消息後，前往超市觀看，小區超市裏的米斗中精光見底，貨架上的袋鹽銷售一空。

在社會互動的、近乎臨床醫學中的催眠性質的集體暗示作用下，行為人表現出強烈的情緒性、失去個性、缺乏理智的思考，並且極易接受暗示，盲從盲信，以致形成同質性的集群行為，即群體感染和趨同行為的蔓延。在社會輿論中，也有一個場——「輿論場」，它是使許多人形成共同意見的時空環境，在輿論場中，個人意識漸漸失去獨立性，個體趨向於只是作為發表社會意見的行為主體，而不是發表個人意見的主體。

針對第二次搶購風波，政府及時發佈「廣東備有百日鹽半年糧」的權威訊息，《廣州日報》頭

版被貼在許多商場的門口以穩定民心，加之政府積極組織貨源，規範市場，較好地穩定了市民的情緒，搶購潮很快消退。此輪媒體報導直至 2 月 25 日廣東省政府發表《要求最終戰勝「非典」型肺炎》告一段落。

但是由於此前一時期政府謹慎保守的態度和滯後表現，大多市民的心態是既渴望聽見官方聲音，但又對所聽到的內容多多少少持某種懷疑態度。

個案 2：T 先生，33 歲，深圳某報社編輯。春節沒有回老家，本來打算正月十五前後接岳父岳母前來照顧 2 歲半的兒子。2 月 10 日上班以後從同事口中得知「禽流感」正在流行，陷入無所適從：把兒子送老家吧，心裏捨不得，旅途上又冒風險；可不送回去，又怎忍心要求兩位老人冒險投入「疫區」？他每天一大早就買報紙，打開電視，希望能有讓他寬心的消息，可他不敢相信，他打電話給有醫院關係的朋友，向他們打探消息並徵求他們的意見，幾番躊躇推敲之後，還是決定把兒子送回了內地。誰曾想，僅 2 個月後內地也不保。

所以，儘管此時官方、媒體的報導連篇累牘，但百姓仍將信將疑，他們依舊從其他渠道搜集訊息，與正道消息相對證、相補充，甚至他們更相信其他渠道的消息，並用來作為行動的參考。

下面的個案典型地說明一旦政府失信，它在民眾心中要付出多大的信任成本：

個案 3：某 G，河北石家莊人，廣東某高校博士（課題組 2003 年 5 月 19 日訪談）
2 月份在家就知道了，傳得那麼厲害，誰都知道，我家人告訴買藥。聽別人說，一般都打電話，發短訊。我

的導師（廣州高校）說，他年三十晚上就聽說了。他同學是醫生，給他打電話，他以為是拜年，他同學告訴他廣東流行一種不知名的病，得了就死。到 2 月 24 日我開學回來時感覺根本沒事，說是控制住了，我們倆兒（她和她先生）天天出去找工作。都以為沒有事了，一直到 4 月份北京開始報。廣東也多起來，從學校出現第一個才開始害怕。天天上網，學校網、新浪、雅虎逛一圈。跟同學朋友經常議論。我對政府懷疑，不信任，現在的數字真實不真實？政府敢保證「我的數字肯定是真實的」？很難說，不信去問，大多數人都這種心理。就因為三月分廣東瞞住不讓報，大家都不信了。我經常聽廣播，亞洲人民廣播電台，專門針對中國、香港、臺灣等亞洲地區的廣播，聽世界衛生組織說「中國政府不明朗」。就跟「狼來了」一樣，以後就不信任你了。

如前所述，流言或謠言屬於社會的集群行為，「它只有在現在的組織不能為人們的行動指引方向和提供途徑時才會發生」。¹²由於官方及媒體慢了半拍，公信力受到質疑，其力量難敵小道消息，甚或人們還會對「闢謠」形成一種「逆反心理」。

(3) 2 月 26 日至 4 月 15 日：SARS 悄悄向全國蔓延，官方及媒體注意力轉向伊拉克戰爭，對 SARS 低調宣傳，意見領袖出現，抗非出現轉機。

接下來的 3 月廣東的疫情穩定發展，治療效果也不錯，絕大部分廣東人都認為，「非典」正在逐漸告別他們。此時香港的疫情日重一日，但大陸並不緊張恐慌。此間，「兩會」的召開及伊拉克戰爭這兩件重要社會事件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媒體也將主要精力轉移到這些事件上。3 月 20 日開始，一些內地也開始出現「非典」個案，

並有逐步擴散的趨勢。對「非典」的報導開始零星見於報端。

課題組統計了廣州、北京、海南三地主要報紙每天「非典」新聞報導數量(編者按：由於篇幅限制，文中所夾附的大量圖表未能刊登，謹致歉。讀者可以在本中心網頁的電子版《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中參閱原文的圖表，網址為 <http://home.ust.hk/~scenter>)。可以看出，媒體關於 SRAS 的報導有一小一大兩個高潮。2月11日廣州市政府和廣東省衛生廳相繼召開新聞發佈會之後，《南方都市報》等廣東媒體上出現一個報導「非典」的小高潮，直至2月25日左右，謠言平息，社會趨向平穩而告一段落。此後2月25日至3月20日左右，《南方都市報》上沒有出現關於「非典」的相關報導。3月底到4月上旬，對於「非典」的報導略有增加，最多時可達到4條。4月15日之後的這段時間，各地報紙對於「非典」的報導逐漸增多，並在「五一」前後達到高潮，日報導量每天30條左右，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現在。

民眾方面，在廣東以及中國官方在疫情方面一直輕描淡寫地宣稱「非典」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形下，國人包括北京人的心態也一點都不緊張，彷彿 SARS 離自己遙不可及，諾大的北京城，即使已經出現了幾個、幾十個「非典」患者算甚麼，雖然官方後來承認由於口徑不一致導致在資料統計上有缺漏，但訊息的不準確在事實上造成了百姓心態的過於放鬆，疏於防範，終於造成病毒的更大規模的迅速擴散和爆發。

導致中華民族從夢魘中驚醒的是一位民間意見領袖、公眾的代言人——72歲的老軍醫蔣彥永。

在4月3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張文康拿著資料，面對中外記者以非常肯定的語氣介紹北京的疫情：「12個病例，死亡3例」。當晚，北京301醫院軍醫蔣彥永在電視裏看到了張文康的講話，「簡直不敢相信」，一定是那兒出了問題。他隨即給301醫院掛了個電話，聽到的消息令他久久不能平抑心情：僅301醫院，至4月3日就已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死亡6人。第二天晚上，蔣彥永坐在電腦前，寫下了那封最終導致兩名高

官下臺、改變中國抗非進程的署名信。信以電子郵件的形式發給了鳳凰衛視和中央電視台。4月8日美國《時代》周刊採訪蔣彥永，老軍醫把自己知道的都說了，「我覺得醫生不講真話，死人要多，國家要吃虧」，外界一片譁然，世衛組織在第二天就明確批評了北京的疫情報告系統，認為北京的非典病例遠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數位。4月11日，北京被世衛重新定為疫區。

此後，政府的表現發生了變化。胡錦濤和溫家寶分別到廣東和北京佑安醫院抗非一線視察，預示著抗非戰役即將打響。

蔣彥永，這位有著51歲黨齡的老軍醫，敏銳地感受到了社會的脈搏，在大家都不說話的時候發出了自己真實的聲音，而這一先知先覺、真誠無畏的「聲音」推動了一個民族面對災難。

鍾南山是另外一位傑出的意見領袖。早在兩會期間，鍾南山就對「衣原體說」堅定地表示了懷疑；而在4月3日新聞發佈會張文康幾次強調「中國局部地區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之後，鍾南山一直堅持要修改說法，「有效控制」應改為「有效遏制」。一字之差，凸現了一位優秀學者嚴謹的科學態度和不懼權威的凜凜人格。他沒有空洞的豪言壯語，輕輕一句「我只是想把工作做好」，激發了世人對於「敬業」的深思。

這兩位不憚於把真相告訴大眾的老者，發出了社會輿論的最強音。

(4) 4月15日以來，SARS 冲高回落，官方及媒體與意見領袖合作，引導社會輿論，共抗非典。但在農村出現了較為複雜的輿論局面。

以4月15日胡錦濤講話為標誌，中國抗非進入新階段。4月20日，高強在新聞發佈會上真實地報告了中國的疫情數字，接著張文康、孟學農相繼被免職；王岐山任北京代市長；吳儀任衛生部部長；對疫情重點區域實行隔離控制……一個個舉措不斷出臺，政府竭盡全力補救、控制嚴重的「非典」局面；另一方面，坦誠地面對媒體和公眾，吳儀曾坦言：「對前階段政府與傳媒的溝通不夠，應作出道歉」。¹³ 現在政府以積極的態

度尋求與媒體的合作，使之傳達政府自己的聲音，「邊做邊說」（王歧山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節目採訪時語），每日疫情公佈，每周兩次新聞發佈，在權威媒體上接受採訪，向民眾表明「政府正在做事」（王歧山語），這一切都為了安定民心，引導民眾有效對抗「非典」。

當 4 月 20 日官方突然公佈北京的「非典」患者達 339 人時，北京市民先是經歷了一個極度恐慌的階段。搶購藥品、速食麵、消毒液、日用品，封城的傳言，大學生、外地民工如驚弓之鳥般地逃命……其倉皇窘態和恐慌程度有過當初的廣東而無不及。此外，山西、內蒙古、河北……烽煙四起，恐慌蔓延全國。從內心說，大眾是渴望相信政府的，他們的心隨著政府的聲音而起起落落。突然到來的嚴重局勢著實讓他們難以承受，手忙腳亂。

在經過短暫的驚慌和抱怨之後，絕大部分市民們理性的認可了政府的表白和措施，並且積極配合政府。從上海師範大學一位被隔離的女大學生寫給媽媽的電子郵件裏，我們就能讀出一種成熟和理性：「隔離，是為了我的安全，也是為了所有人的安全。……真的好想出去，可我不能，這不光是紀律問題，更是道德和良心」，「隔離，對我來說，是一種責任，卻也是一筆財富。經歷『非典』，讓我看到更多，更加成熟」。¹⁴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對於一個有為的民族來說，災難可以化為財富。從災難中，民眾提高的不只是承受力、成熟度，還有他們的判斷力和凝聚力。

在這個時期，與官方及媒體一起發揮引導社會輿論的，還有許多意見領袖。他們受電台、電視、報紙的邀請，或介紹防非知識、或回答受眾問題、或發表自己看法，務實求真，獲得了群眾的信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的「關注非典殲滅戰」節目中，每天都請專家接受採訪。筆者每日必聽，其中，5 月 21 日曾教授的一番話印象深刻。進入 5 月中下旬，全國的疫情大大減輕，又一輪麻痹大意悄悄來臨。曾教授大聲疾呼要警惕鬆懈情緒：

雖然疫情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各地都還

有，不時出現。就像救火一樣，一星半點明火，晚一點，就成熊熊大火。須知，傳染病的數量是呈幾何數增長的。決戰的時刻，稍一疏忽麻痹，過去的努力都會化為烏有。

拳拳之心溢於言表。正是許許多多這樣的有識之士，不僅為管理層提供建議和對策，而且引導社會輿論向正向發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訊息渠道和社會文化基礎的不同，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的整合程度不高，部分農村的群眾在心理狀態和認知、意識上，與城市大眾存在明顯差異。首先，農村作為傳統的鄉土社會，同質性強，在主流訊息渠道不通暢或功能不強的情況下，傳言、謠言有愈演愈烈之勢。如 5 月以來迅速泛濫到 14 個省的「啞巴說話」事件就是典型。其次，農村相比於城市，流言更不容易消弭。城市市民文化程度普遍高於農村，訊息渠道通達，流言會止於智者或止於公開。而在農村，經濟條件、設施比較落後，有的貧困地區，一個村也沒有幾台電視，有的人家甚至不通電，他們也沒有讀報聽廣播的習慣，因此，在農村主流媒體聲音相對微弱，訊息主要是口耳相傳，人際傳播更具影響力和控制力，謠言不僅離奇而且影響持久。傳聞、謠言，夾雜著封建迷信，使得農村和農民中的輿論狀況複雜而難以引導。（本文在第三部分將詳細論述）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會輿論的流動變化與 SARS 的發展過程相始終。由於官方及媒體、事件清晰度（包括對疾病本身瞭解程度和輿論環境的透明度）、個體判斷力、意見領袖以及社會文化基礎等相關因素的變化和地區差異，社會輿論的流佈和形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3、大眾傳媒的引導與社會輿論

整個 SARS 事件中尤其是 4 月中旬以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內容對社會輿論的引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報紙、電台、電視台、網站紛紛推出有力的報導和欄目引導輿論。課題組選取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報紙，對報導的內容分為五類進行分析。具體為政府政策和號召、防治、醫護事跡、病情和其他，其他指社會其他領域的反映、個案（某

些不法商人、謠言傳播者等)還有國外對於非典型肺炎的一些舉措。

(1)《人民日報》

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報紙，國家政策和號召反映的窗口，在4月9日以後對於政府政策和號召的報導處於上升的趨勢，並且相對其他的內容佔了很大的比例。當中除了中央方面的舉措，還報導了國內部分省市政府的舉措，但是對於物質調配和物價控制的報導相對於《南方都市報》和《南國都市報》所佔的比例要少很多。在防治方面，斷斷續續出現小高峰，但是在總體上並不是很明顯，醫護事跡的報導顯的更少，在4月13日後每天只是1到2條的報導。大家會發現其他類別在4月9日後起伏性很大，有5個高峰點。《人民日報》的其他類比較多的是國際消息和時事評論類，還有各地的各領域所作出的反應和舉措。

(2)《南方都市報》

從2003年2月初到2月18日之間廣東發生了兩次「搶購潮」，政府開始認識到非典型肺炎的嚴重性，民間謠言和揣測頗多，所以2003年2月11日到2月18日之間，報導的重點是政府部門的回應，而重中之重是政府部門對於物價的調控和社會對於非典型肺炎所作出的反應，以正面消息為多，起到穩定民心的作用，兩次「搶購潮」過去後，廣州至此未出現新的「搶購潮」，民眾慢慢開始認識「非典」，緊張的氣氛舒緩了不少。此間對於社會領域的各個反映的報導也是佔據一個比較高的比例，病情和防治方面的報導只是零星的出現，而醫護人員事跡的報導在圖上基本不見。

4月6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派人到廣東調查後，從曲線圖中很明顯可以看出，防治方法和措施的新聞佔據一個新高，當中基本上是防範性的，取消一切可能的大型團體聚集，還有關於「五一」假期期間各個部門的防禦措施。其次是政府部門和領導人相應的一些措施和號召，這些關注和重點是來自中央在4月份以前在這方面的報導是較少，第一次的高峰期政府的政策和號召主要是省內領導，這和北京疫情惡化是密切相關

的。物價調控的新聞雖然有明顯減少的現象，但是基本上每天都有相關的報導，相對持平，「搶購風」在廣州基本平息。不見患者或是康復者的專門報導。原來不定時的疫情報導在張文康事件之後變為每日疫情報導，可以讓人們能瞭解這個疾病的蔓延、治療的情況。社會對於這個疾病的關心度也提升，當中大部分是來自社會不同領域對於共同防治這種疾病的關注，還有不同的集團公司對醫護人員的獎勵和關懷，但也有一些利用此次疾病發財和矇騙群眾的事件也有報導。

(3)《北京青年報》

從圖中大家會發現除了「其他」這一線是連續，且在4月8日後不斷地上升，在4月30日上升到了57條，當中報導的以感人的個案為主，圍繞著「非典」發生的關懷、鼓勵、贊助的報導佔據很大的比例，還有國外疫情各方面的報導。在此報對於政府的政策和號召反而比較少，防治類的也比《南方都市報》少許多，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報在病情報導上也是比較少，在後期其他報紙開始每日一報的時候，此報也沒有，只是在4月23日到4月30日之間出現一到兩條的報導，且主要是北京市的情況。

(4)《南國都市報》

海南省是沒有發生病例的地方，4月中旬後，當地政府開始重視。在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政府政策和號召的報導量佔很大的比例，這裏主要是中央、廣東省和海南本省政府的舉措，除了防範措施外，當中對於物價穩定和物資調控方面的報導數量也是相當多的。此報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對於疫情報導的關注，從4月21日以後每天都有報導，報導疫情的地區有國內、省內、廣東省還有國際的。醫護事跡和防治方面的內容較少且零散，很難看出走勢，不過醫護事跡是在鄧練賢事件之後才開始出現的。在其他類別中和廣東的情況相似，一些在「非典」中的個案(各地)，有值得讚賞的也有值得批評借鑒的(不法商人、商家的防禦措施、民眾防治「非典」的問題例子、民眾對於政府措施的反應)，特別對

一些小診所的關注，還有其他省市和國家的防治情況的報導。

4、SARS 中社會輿論的作用

在抗擊 SARS 這一突如其來的災難中，正面的社會輿論與負面的社會輿論交織在一起，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但社會輿論亦起到了一定作用，正面的作用主要有：

1. 影響政治過程，推動對事件的解決

民眾之間傳遞、求證 SARS 傳聞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求真」和「求知」的歷程，雖然有虛妄、有扭曲、也不乏居心叵測的利用，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在廣州還是在北京，都是社會輿論迫使官方和媒體直面 SARS 現實，不能迴避隱瞞。尤其在北京，輿論直接扭轉了事件的進程，開啟了新局面。

輿論還影響了法律的制定，新的「傳染病防治法」已經應急出臺，人們還在呼籲有關民眾知情權的立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俗話說「人心是稱，民怨是鍾」，社會輿論是社會的一個天然監督系統。

2. 社會預警環境

群眾最貼近於生活的實際，因而對現實有敏感的反映。群眾對某一事件或問題的議論對社會的發展有預測作用。建立社會預警機制，不可忽視考察社會輿論這個環節。

3. 規範個體行為

輿論對社會行為有規範作用，它能從道德的角度來制約、引導人們的行為。例如，有一位已經在北京確診並住院治療的遼陽籍張姓「非典」患者，在住院期間擅自離院，帶著女友乘坐火車和計程車逃回遼寧老家，並在家中躲藏多日。這一嚴重事件披露後，在各地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紛紛譴責該患者這種嚴重不負責任的無德行為，有更多的人則指出：該患者此舉已經觸犯法律，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

4. 社會心理調適

當人們遇到不明事件而原有的常識又無法說明時，人們迫切需要通過與他人互動交流，建立新的參照，以維持心理平衡。當 SARS 在廣東發

端時，有的人看見眾人買藥，自己不知道為甚麼，也不知買甚麼藥，但還是跟風去買，若沒買到，心裏更加恐懼。這些情況說明，面臨突如其來的社會變故，人們會通過社會輿論的各種形式來調節緊張心理。這其中，意見領袖的言行具有較大的引導作用。

5. 喚起美德，豐富民族精神

無論人們對 SARS 如何評價，SARS 及其引起的包括社會輿論在內的社會意識將積澱為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成為我們民族文化寶庫的一部分。「非典」對我們社會方方面面的衝擊和影響，諸如衛生觀念、健身觀念、親情觀念、道德觀念、誠信公信觀念、民族凝聚力等等，以及「非典」時期的「非典文化」、「非典心態」、「非典生活」和「非典日誌」等等，都為這段歷史經歷繪就獨特的色彩和風景。SARS 的文化影響力決不限於當今，它將伴隨我們民族的成長代代相傳，對後人起到警示或者鼓勵的作用。

三、社會輿論背後的深層次問題

SARS 事件所引發的引爆式社會輿論，除了與疫情的發展和人們的恐怖心理有密切關係以外，我們不能忽視社會輿論中反映的深層次文化傳統和中國人的「集體表像」(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ence)。很多事件如「啞巴說話」看似荒唐，但放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又是最正常不過的社會反應。

1、SARS 等突發事件容易激發某些個體的深層無意識，形成社會輿論的基礎

產生廣泛社會輿論的一些議論最初是哪裏出現的，是人們喜歡追問的一個問題。例如各種流言的發源地在哪裏？是通過甚麼途徑傳播的？我們認為議論的最初發源地是多元的，正因為民眾有相似的集體表像，所以很多輿論最後竟殊途同歸。不論輿論的主體是醋還是板藍根，是大米還是食鹽，是啞巴還是嬰兒，是綠豆粥還是艾蒿，其產生和傳播的模式都是共通的：突發事件激發某些個體的深層無意識，經過不斷的傳播和放

大，激發社會的深層次意識和集體表像，到最後形成心理慣性和文化定勢，沉澱成集體表像中新的內容，反過來構成對社會潛在的影響。

人在清醒時，感觀接受外來刺激，引起表層心理活動，這種表層心理是對現實的反映。深層心理的內容是本能的，是世代相傳的集體表像。而中層心理內容是被遺忘的概念和意象。突發事件刺激時，部分神經質的個體和比較敏感的個體，表層心理抑制了，中層深層心理啟動起來，釋放出來，從而獲得「啟示」、「靈感」和「特異才能」。這些「啟示」、「靈感」和「特異才能」，是人的潛能的充分釋放（發揮），而所獲「啟示」的內容取決於他的深層和中層心理結構中所儲存的訊息。故在「非典」事件中，某些個體如廣東增城一個老太太就稱是日本鬼子打來了（這是她深層心理中戰爭恐慌的遺痕），米荒鹽荒則是某些個體對曾經存在過社會震蕩首先帶來饑荒的反應。社會記憶和放大機制，使放鞭炮、點香、插艾蒿迅速成為廣大民眾應付「瘟疫」的有效手段。

2、社會輿論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民間信仰

很多社會輿論的形成與民間信仰有很密切的關係。民間信仰是國人集體表像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¹⁵中認為集體表像在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感情。在國人的心目中，面臨災難和瘟疫等不可控制的事件，燒香拜佛是最普遍的「應對」方式之一。各種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都可以通過神降和神媒、特異人士從神靈中得到啟示。這次 SARS 事件激發了各地相似的集體表像，「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湖南益陽「求神拜佛」防非典，山西某縣祭拜「神漢」防「非典」，5月中下旬，陝西一些鄉鎮又出現焚燒「萬人傘」防「非典」的做法。而「啞巴說話」的例子最能夠說明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據《南方周末》報導，「多年啞巴開口說話，放鞭炮驅非典」、「一嬰兒出生即能言」，最初

約在5月3日左右大規模出現，較早集中在兩湖地區，5月4日開始，此流言在湘鄂兩省全境傳播。5月5日開始，流言越過省界，通過電話向周邊省市傳播。5月6日此流言達到頂峰：當日，安徽宣城、阜陽、亳州、六安、廣東汕尾和梅州地區、江蘇高淳縣、貴州六盤水、山西朔州大同、陝西西安、福建省、江西省、雲南省境內部分地方出現流言，部分鄉鎮大放鞭炮。5月7日凌晨，四川成都部分鄉鎮出現流言，「必須在7日凌晨兩點前喝綠豆稀飯才防非典」。5月7日，廣西南寧、武鳴、憑祥等地出現流言，流言被更改為「天等縣一婦女懷孕兩年生子說話，說完就死」。5月8日晚，浙江縉雲、東陽、永康等地出現流言，部分地區鞭炮脫銷。從5月6日開始，各地政府開始公開闢謠，並試圖尋找和處理流言傳播者。從5月9日開始，流言傳播衰減。此流言至少傳經中國的14個省份，其間只用了4天時間。

從下面的個案也能夠看出「啞巴說話」的流傳速度和影響面。

個案4：L某1，女，47歲。湖南N縣H村村民（H村位於省道旁，距離省府120公里，縣城70多公里）。資料來源：課題組5月5日做的個案訪談。這幾天我從電視裏面看到廣東的情況有好轉，但是鄉下的形勢似乎越來越嚴峻。政府非常重視，每個村設了一個點，負責收集全村的消息上報鄉政府，鄉政府也派人給村民傳達防治非典的注意事項。有人說NX縣城已經有了「非典」的患者。村上的某某從廣州回來，說是看到在火車上就倒了一個。5月3日凌晨3點，我的弟弟給我打來電話，說到處傳言某某地方一個啞了30多年的啞巴突然開口說話，告訴人們預防「非典」的「妙方」——點三根香、采三根艾蒿、三株石菖蒲插在門上（這不就是傳統避邪的通常做法嗎？），放一封鞭炮。差不多同

一時間段，村裏的鄰居們不知從那裏得到了這一相同的消息，主要是親戚打電話告訴的吧，紛紛準備，打著手電筒采艾蒿和石菖蒲，我忙到5點多才完成這個事，心裏一下子舒服了很多。村民一直斷斷續續放鞭炮，鞭炮聲響至第二天上午10點。後來才知道，方圓幾十公里內，到處是鞭炮聲。該消息是從20公里以外的L鎮傳來的。

個案5：L某2，男，42歲。湖南N縣S村村民（S村位於省道旁，距離H村2公里，L某2系L某1的弟弟）。5月2日的晚上10點，我姨妹從20多公里外的外鄉給我打來電話，說是縣城一個30多年的啞巴突然說話，告訴人們預防「非典」的「妙方」——點三根香、采三根艾蒿、三株石菖蒲插在門上，再放一封鞭炮，叫做送瘟神。我剛開始不信。5月3日早上一大早我到長沙辦事，早上還沒有甚麼異常的事情，下午回來時，看到沿公路的幾個鎮到處在賣艾蒿和石菖蒲，放鞭炮，我想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回來就照著大家的做法做了。我當天晚上很晚給我姐姐打了電話告訴她這件事，沒有跟鄰居說。但是第二天全村很多人都知道了，都是從親戚朋友處聽來的。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驚歎於這一流言的產生傳播速度，也沒有必要追究是哪裏最初產生的，最重要的是這一事件背後反映的因素。訊息高度發達的社會，由網絡、電話、短訊和人們之間的口語相傳構成了一個在速度和廣度、普及面上都空前的民間訊息傳輸系統，只要這一訊息有市場，能夠滿足人類的某種需要，都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傳遍大江南北。何況集體表像具有社會強

制性，「社會置身於輿論氛圍裏，所有輿論都是一種集體形式，都是集體產生的結果」，「在小城鎮裏，任何人要想脫離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的習俗，有時便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¹⁶

「啞巴說話」之所以能夠受到普遍歡迎，成為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組成部分，從它的核心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它與中國人的集體表像找到了最好的契合點。一是在人們普遍焦慮和緊張的時候，「找到了治療和預防非典的特效藥」這一訊息給了人很大的振奮，二是這些「神方」的訊息來源有神異的色彩，加深人們對訊息的信任。啞巴也好、嬰兒也好，其正身都是「比較異常」的人，在人們的潛意識裏，充當了神媒的作用。使人們對之深信不疑。三是特效藥本身也符合國人的一貫傳統——點香增加了神聖性，放鞭炮本身就是傳統的驅邪方式，艾蒿、石菖蒲都是中草藥，而綠豆粥也有清熱解毒的作用，所以「啞巴說話」在南方的版本流傳艾蒿、石菖蒲，在不出產這些草藥的地方它們就被綠豆粥代替了。所有的版本中，「抗非典」的物資都很廉價，「儀式」很容易做到，所以很容易被接受。

3、社會輿論背後的疾病解釋方式

不同文化背景導致不同群體在疾病解釋、保健行為及至體系建構上都體現出差異性，我國農村地區以「人瘟」這一辭彙指代烈性傳染病，就反映了民眾的疾病解釋方式。而針對「SARS」進行的消毒行為則是基於病毒的觀念。如果說放鞭炮是迎合了農村的疾病解釋方式出現的群眾自發演出，板藍根啤酒、板藍根肥皂則是個別奸商充分利用了城市的疾病解釋方式上演的一出鬧劇。

從民族語義學的角度看，「人瘟」、「瘟神」這些辭彙所包含的恐怖、可怕和豐富的感情色彩，使人對SARS頓時增添三分畏懼。SARS是一個新事物，短時間內不能為人類所瞭解、征服，由於受到科學知識的局限，一般農村村民不會去考慮SARS的病因，而是從原有的一套病因觀中尋找合理的解釋方式，既然是人瘟，那就可能是瘟神引起的，所以送瘟神當然就能驅除這一傳染性疾病了。

一般而言集體意識以形成病因觀的方式來對各種生理表徵異常進行解釋，以社會常識的方式對疾病的性狀進行規範，以社會輿論的形式來對疾病進行控制，除了傳染病以外，民間的其他疾病解釋方式也值得進行高度關注。

4、社會輿論反映了不同地區的醫療保健差別

從預防和控制 SARS 的角度看，其實在城市流行的薰醋和買板藍根與農村的掛艾蒿、石菖蒲、喝綠豆湯實質是相同的，不過起安慰作用而已。城市的人相信醋的特效而農村的人相信艾蒿，折射了兩者在醫療保健體系上的差別。

醫療保健可包括下列三種形式：普及性一自我形式、民間部門形式和專業部門形式。普及性一自我醫療保健是社會上一種非職業性、非專家性的方式。它無需請教醫生，而主要是親戚、朋友、鄰居、同事的幫助和治療，它包括自我治療和自我用藥，醫療保健的場所主要是家庭，當這種方式不能解決其疾病的痛苦時，求助於其他兩種保健形式。民間部門保健是一種以非官方醫療系統的醫生，而以江湖郎中和巫醫為主的一種方式。民間醫者的風格和觀點各不相同，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對疾病、健康的看法，其地位介於普及方式和專業方式之間。專業部門的保健包括組織的、法律認可的醫療專業組織。它不僅包括專業的醫師、藥師，而且包括助產士、護士、理療員等輔助性的醫療職業者。專業方式主要表現為醫院。

保健模式的選擇及保健制度的形成總與特定需求相適應，人們一般依據疾病的自我或社會判斷尋求相應的處理模式，恢復生理或心理正常狀態。在農村和城市，由於醫療體制和物質水平的不同，在個人的保健體系上有很大差別。城市主要依賴於普及性一自我形式和專業部門，而農村則三者共同依賴，小病往往依賴自我保健形式，大病依賴專業部門，而疑難絕症則依賴民間部門形式。在普及性一自我形式方面，城市更傾向於從科普宣傳中獲取知識，農村更容易從民間傳統中汲取智慧。SARS 對農村是新傳染病，所以農村在面臨人瘟時就選擇江湖郎中和巫醫式的送瘟

神；城市依賴於專業部門，醫生說要薰醋要服板藍根，普及性一自我形式也有這樣的概念，大家就照辦。

四、結論和建議

社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論是傳統哲語還是現代學術的宏論，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的許多學派¹⁷，都把社會和文化看作是各個部分有機聯繫的整體，只有堅持整體論的方法，才能更好地解釋社會、文化現象。突發性的 SARS 打破了社會原有的平衡，勢必引起人們在言論、心理和行為上的反應，而各種集體反應的強度、發展勢態則由原有的社會文化基礎和即時的 SARS 情況、政府的措施等決定。SARS 已經超越了對個體影響，引起了集體的反應，變成了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社會輿論作為社會反應的一部分，只有放在整個社會環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引導。

從社會輿論的外部背景看，目前政府的各類措施已經相當得力。包括一系列措施和法律的出臺，正式訊息流通渠道的暢通和高效，這裏不再贅述。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務院 6 日下午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部署了做好農村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 9 項措施。這些措施為確保農村不發生大規模疫情和社會輿論的平穩提供了堅實的保障。¹⁸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在社會輿論層面，大眾傳媒在引導城市的輿論導向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在農村，由於人口多居住不集中，正式的宣傳手段和途徑仍不足以完全覆蓋所有的村民，所以加強對廣大村民的輿論引導很有必要。但是我們不應該以簡單的科學和迷信的二元對立來看待 SARS 事件中的種種傳言現象，充分考慮傳言的社會土壤。基於此，我們提出以下的短期建議。

一是政府要確保訊息的準確度。作為新的傳染病，不同背景的群體會有不同的解釋，容易導致 SARS 的各類訊息特別龐雜，群眾最關心的 SARS 預防方法也比較多，但存在魚龍混雜的現象。政府要建立起責任、理性、可信的形象，主

動發佈與大眾攸關的公共訊息。要保證這個渠道的公開、暢通和可信，使政府真正成為抵制消解流言的權威機構。各級政府和防疫部門要對各類訊息進行監測，讓老百姓知道哪些是虛假訊息。

二是對於短期存在的謠言，採取疏導而不是堵塞的方式。政府要用寬容的心態看待這些謠言，相信群眾，只有政府的各項決策和實際行動得力，切斷「非典」傳染源，宣傳落實衛生措施，謠言馬上就會自動消失。對一些不致危害社會的民間迷信活動、謠言（如萬人傘、掛艾蒿、放鞭炮、喝綠豆湯之類）不宜強制取締，應借助媒體向民眾解釋說明，待事態平息後，人們自會漸漸明白是一場鬧劇，在 SARS 期間，營造寬鬆的社會氛圍有益無害。

三是注意新聞媒體的用詞。從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定的社會輿論反映一定的集體表像和一系列制度文化心理背景，不應在報紙、電台和電視上用封建迷信、愚昧落後渲染發生在農村的一些現象，大眾傳媒儘量用一些中性詞會更好，更適合。

四是在城市要發揮各種心理諮詢機構和作用，開通心理諮詢熱線，幫助人們舒緩緊張情緒，以積極平和的心態應對「非典」。在 SARS 過後，仍然要注意加強心理諮詢工作，以提高大眾的心理承受能力，減少引爆式社會輿論的發生頻率。

五是在鄉村傳播正式訊息要採取多種形式。在鄉村發佈標準訊息不是通過電視和報紙可以完全覆蓋和奏效的，要考慮與農村社會原有的社會文化基礎相適應，充分發動民間精英，通過口頭傳播，將正面的訊息傳達開去，消除謠言和各種小道訊息。

六是注意引導城市裏的外來工。城市裏的外來工尤其是外來散工，缺乏有效的組織保障，在目前不宜流動的情況下，輸入地政府要做好外來工的服務工作，在外來工聚居地建立起 SARS 監測體系，進行各種類型的宣傳，為他們排憂解難，消除外來工的恐慌，使他們和家人安心，有利於社會輿論的引導。

從長遠來看，要從社會制度和集體表像的層

面解決傳言、謠言等負面的社會輿論。就突發事件而言，不管是傳染性疾病還是其他天災，從政府和社會層面上講，一是可以設立類似「突發事件預防和監測中心」的常設機構，利用「突發事件預防和監測中心」網站，建立面向大眾的訊息平臺和內部訊息交流的安全通道。對外的訊息平臺採用網上專家解答，介紹突發事件，向公眾解答疑難問題，網上新聞發佈會等方式。這樣，就會有反應高速暢通的正式訊息公佈渠道，不容易滋生謠言。二是就傳染性疾病而言，要建立合理有效農村醫療衛生體系。SARS 對農村的威脅讓舉國上下憂心忡忡的原因除了農村幅員遼闊、勞動力流動頻繁而造成防範困難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農村醫療體系不健全，農民還不富裕，手頭缺錢。有了強有力的醫療保障體系作後盾，農民就不會相信各類「啞巴」說出的療法。三是就社會輿論而言，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整套合理有效的輿論制度，尤其要健全基層的人大，使之真正代表民眾的呼聲。民眾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輿論就有了正常的上通下達途徑。

從集體表像的層面看，一是要看到民間信仰和輿論引導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鄉村社會由於其發展上的相對封閉性和滯後性，它不僅要受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因為傳統文化所受外界衝擊相對較小以及其本身的慣性，傳統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對鄉村社會影響是巨大的。只有標本兼治，才能有一個和諧文明繁榮的鄉村，引導鄉村的輿論也就迎刃而解。

二是要把握民間信仰的規律，採取有效的引導方式。民間信仰有很多負面的功能，與現代社會不相適應，但它在社會和心理層面對農村社區和農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完全摧毀民間信仰而沒有別的手段彌補民眾的相關需要，就不能真正改變民眾的民間信仰。可以考慮民間信仰「舊瓶裝新酒」，適應時代需要進行改革。

三是要推廣科普，提高民眾的科學意識。不論城鄉，科普的任務仍然很重，科盲不少。除了大眾傳媒的廣泛宣傳和政府的推廣外，可以由大學生成立志願者科普隊，利用下鄉和社區共建，

以活潑多樣的形式推廣科普。

四是提高民眾的教育水平，培養公民的獨立思考能力。公民有了判斷力，就不會輕易相信各

種傳言，就不會輕易隨波逐流，從眾隨大流，社會負面輿論的傳播就沒有了推波助瀾者。

註釋：

¹ 本課題由周大鳴教授負責。課題組成員有梅方權、王琛、朱嫦巧、譚麗華、陸建新、周維、段苒、張銀鋒等。本文完成與5月22日，課題組將繼續跟蹤這一課題。

² 詳見《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流言：4天飛傳14省〉報導。我們把這一系列流言統稱為「啞巴說話」事件。

³ 李良棟：《誤區與超越：當代中國的社會輿論》（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⁴ 劉建明：《社會輿論原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211。

⁵ 見《南方都市報》，2003年2月12日。

⁶ 卡普費雷、鄭若麟、邊芹譯，《謠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18-19。

⁷ 這裏的事實內容主要參考《南方都市報》，2003年2月12日和2003年5月21日報導。

⁸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新聞傳播學》（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頁77-78。

⁹ 孫非、李振文，《社會心理導論》（武昌：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7），頁262。

¹⁰ 劉建明：《社會輿論原理》，頁70。

¹¹ 《南方都市報》，2003年2月12日。

¹² 轉引自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400。

¹³ 《南方都市報》，2003年5月21日。

¹⁴ 深圳《晶報》，2003年4月29日。

¹⁵ 列維·布留爾、丁由譯，《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¹⁶ 涂爾幹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出版社，2000），頁17和頁255。

¹⁷ 見布朗，《社會人類學方法》（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¹⁸ 見《溫家寶：千方百計確保農村不發生大規模疫情》，國務院網站5月6日新聞。

書訊

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合辦的《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已於四月出版。該學刊為半年刊，每年4月和10月在香港出版。該學刊主要刊登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並實行匿名評審制度。凡有意訂閱該學刊者，請與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絡（電話：(852)23587778、傳真：(852)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下為該學刊第一卷第一期各篇論文的題目：

歷史的人類學化和人類學的歷史化——兼論被史學「搶註」的歷史人類學（張小軍）

從「異民」到「懷遠」——以「懷遠文獻」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寧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罷考事件（梁洪生）

胡田寶與清中葉同性戀話語（宋怡明）

利益與秩序——嘉慶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縣的土客仇殺事件（邵鴻）

傳統的循環再生——小欖菊花會的文化、歷史與政治經濟（蕭鳳霞）

光緒年間雲南鼠疫流行模式——以市鎮與村莊為基礎的研究（曹樹基）

道德、權力與晉水水利系統（沈艾娣）

香港道教送瘟祈福法會及其辟瘟經文

游子安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一、道教與社會

香港道堂通過道教科儀，為香港社會祈福禳災，其來有自。每遇災禍，香港道教團體參與超薦法會，以求安陰利陽。如 1918 年馬棚大火，約六百多人遇難，事後在愉園蓋搭醮棚，延請鼎湖高僧及應元宮道士開壇作法事，超渡亡魂，當年參與建醮的道堂包括牛池灣的先天道派的萬佛堂。¹ 1972 年「六一八」雨災，山崩樓塌，觀塘安置區受災嚴重，青松觀、六合聖室等道堂前往災場為遇難者作安息法會。及後，香港佛道團體舉行超薦法會，分設佛教、道教、潮僑三大主壇及分壇，誦經禮懺，追悼「六一八」雨災全體罹難者。參與道教壇計有：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觀、松蔭園佛道社、圓玄學院、蓬瀛仙館和抱道堂等。² 又如香港在 1970 年代以前水源緊缺，道堂也曾為旱災祈雨。1955 年春天，歷時兩月乾旱，通善壇、龍慶堂與善慶洞特發為「祈雨法會」；³ 1963 年大旱，本港 4 天供水一次，六合聖室設七星祈雨壇祈雨。⁴

2003 年春天，香港非典型肺炎肆虐，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農曆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香港道教聯合會聯同 16 間道堂舉行「消災解厄祈福法會」，地點選在沙田車公廟前翠田街足球場。（圖一）本文對這次法會，及期間誦唸的《辟瘟妙經》等相關文獻，作了扼要的記錄和解說。

二、遣送瘟神的習俗

瘟神亦稱疫神，即主司瘟疫之神，此信仰源於古人對瘟疫的恐懼。瘟神是多種惡性和急性疾病的凶神，對於這種凶神，人們不敢得罪，唯有請道士行法遣送瘟神。瘟神只能「送」、「驅」以請走，而不能說「滅」瘟。古代有「五疫」之說，而瘟神多為 5 位。被稱為中國諸神百科全書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載「五瘟使者」的名號：「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

空三五丈，……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總管中瘟史文業』……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⁵ 這次祈福法會，其中一位驅瘟主神是「和瘟教主匡阜真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廬山匡阜先生〉載「姓匡名績，……號匡阜先生」，「凡水旱厲疫，禱之皆應焉。」匡阜真人游江南，將五瘟神收為部將。為何稱「和瘟」？李豐楙說得明白，他引用香港長洲太平清醮舉行的「遣船」科和臺灣南部沿海瘟醮，配合民眾的和瘟、拍船，道士使用神咒和瘟、遣瘟法，認為「和」是先行懷柔的語氣，「遣」是強制語氣，務求「掃除淨盡」，潔淨境域。⁶

有關送瘟，可從古代驅疫鬼的「儺」說起。「儺」是年終舉行逐疫驅鬼的儀式，《後漢書》〈禮儀志〉稱：「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南朝梁宗懷《荊楚歲時記》有臘日（十二月八日）逐疫之說；宋元時代，民間有祭送瘟神的習俗。道教的送瘟科儀，正是民間習俗的規範化。⁷ 據說，南方逐疫的作法，將船焚化放入海中，能將災疫帶走。因此，宋代以來，送瘟例要用船。例如臺灣有瘟神之祭典，此俗傳自福建，稱「王醮」；放王船之習俗，號稱「送瘟」。「建醮之時，裝飾帆船，載上王爺神像或其他器物，號稱王船，放流於海或予焚化之俗，頗為盛行，號稱送瘟，眾皆相信，如此作法，將疫癘帶往他方，人民可免遭殃。」⁸ 又如雲南省昭通地區鎮雄縣的打醮活動，約在明朝中期由中原一帶漢族傳入。一類為祈求甘霖的「打雨醮」，另一類為驅瘟的「打清醮」。其中送瘟的「掃（送）船」儀式來自道教，瑤族製作「羊船」把瘟疫送走，「羊船」既是送瘟工具又是祭品。⁹ 香港道教聯合會在這次法會特別紮作了一艘 15 呎長的法船，作和瘟

遣舟科儀之用。(圖二)因地制宜,這次送瘟法會的法船「予以焚化」而非「放流於海」。舊時江南有紙船明燭送瘟神之風俗,其辦法是用紙紮船一艘,請瘟神、五方行瘟使者接送上法船,將法船焚化,返歸神界。¹⁰

三、香港「消災解厄祈福法會」的行儀與解說

香港道教聯合會舉行連續 7 天之「消災解厄祈福法會」,誦經禮懺,藉此為市民祈福消疾。香港道教以前做過祈雨等科儀,但沒有做過驅瘟,籌備過程中請教上海陳蓮笙、陳耀庭諸位道長,科本決定選用《和瘟遣舟科儀》、《瘟祖八寶驅瘟法懺》和《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法會設主壇、天壇、地壇、中壇。(圖三)因是祈福道場,主壇奉三清,輔以四御五老;以及北帝、斗姥、天后、龍母、太乙救苦天尊、九天玄女、當年掌管雷部諸神、當年掌管風部諸神等等。¹¹中壇奉三位驅瘟主神,中為「洞淵教主驅瘟疫崆峒感應天尊」(仙尊名號亦見於法船),左為「無上洞淵三昧伏魔天尊」,右為「和瘟教主匡阜真人」。法會期間,市民可請驅瘟符與平安符,大會共派發各八萬張。¹²(圖四)法會行儀節序,簡列如下:

(1) 四月十七日(農曆三月十六日)

三奏龍庭(車公廟上表)
請水淨壇
豎幡、安大士、中壇請聖
開壇啟請(見解說 1)
開金榜
玄門開位
玉皇宥罪錫福寶懺(見解說 2)
開黃榜
玉皇心印經
玄門破獄

(2) 四月十八日(農曆三月十七日)

玉皇宥罪錫福寶懺
諸天朝 玉皇朝
赤松黃大仙師寶懺

太上清靜經 太上道德經 玄靈經
攝召真科(過仙橋)

(3) 四月十九日(農曆三月十八日)

三元賜福寶懺
三元朝 文帝朝
大洞仙經 至寶真經
正陽仁風寶懺
呂祖玄妙經 北斗延生經
聖帝保安寶懺
關燈散花科(見解說 3)

(4) 四月二十日(農曆三月十九日)

三元滅罪水懺
七真朝 武帝朝
金剛水幽

(5) 四月二十一日:送瘟科儀(農曆三月二十日)

太乙濟度錫福寶懺
太乙朝 靈官經 雷祖朝
玉樞經 三元妙經
瘟祖八寶驅瘟法懺(見解說 4)
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
和瘟遣舟科儀(見解說 5)

(6) 四月二十二日:三清濟煉(農曆三月二十一日)

純陽無極寶懺
呂帝朝
結懺科儀
先天斛食濟煉幽科(見解說 6)

(7) 四月二十三日:大供諸天(農曆三月二十二日)

清微禮斗真科
玄門讚星科
玄門供諸天科
圓隆謝表送神

上列行儀節序,有幾方面要解說。

解說 1、啟壇邀請特區政府官員主持祭天儀式,而第一天「開幕典禮」、第五天、第六天和第七

天科儀，各壇參加。七天每日各有主壇，如圓玄學院是第一天主壇，青松觀是第七天主壇。

解說 2、多天誦經禮懺，藉不同的經文懺悔改過，以《玉皇宥罪錫福寶懺》為例，朝禮三清、玉皇等神靈，祈求上天赦罪賜福；《玉樞經》¹³ 則述消災解厄之法，誦此經可解厄解驚。然後舉行驅瘟科儀，首先誦《驅瘟法懺》，繼而誦《辟瘟妙經》，再而進行「和瘟遣舟」。¹⁴ 解說 3、「關燈散花儀」，由「關燈儀」（全稱是「五方關燈科」）和「散花儀」（全稱是「散花解冤結」）二個科儀不間斷地組合而成。關燈科儀儀目的是以神燈之光，把亡魂從地獄引領出來。散花科以「花」作為比興的對象，慨歎人生，亡魂在壇場上聽道士們「說法談玄」，通過教育解除亡魂生前冤結。整個「關燈散花儀」約兩個多小時，科儀以唱為主，具有極強的音樂性。¹⁵ 是次消災解厄祈福法會，關燈散花儀由松蔭園佛道社負責。據說，香港所用「關燈散花儀」版本，來自廣州三元宮。¹⁶

解說 4、《瘟祖八寶驅瘟法懺》，版本來自《回天寶懺》卷六，八寶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懺文讚曰：「八則當成八寶看，良心一點是金丹。懺文不但驅瘟疫，以此回天亦不難。」

解說 5 第五天送瘟，三位驅瘟主神移奉於主壇。和瘟遣舟科儀，選用清末刊印《廣成儀制》的〈和瘟遣舟全集〉：「公文宣示，神聽昭明。仰惟察功錄過，奉天命以無私，布氣行瘟，豈仙壺之妄轉，今則蒙天赦罪，依式遣舟。……」法會籌委會成員梁德華道長講述和瘟遣舟科儀的特色，當天用作和瘟遣舟的法船先用『雷公令牌』作法器，施五雷號令開光，請三位驅瘟主神帶領五方行瘟使者、瘟部總管，登上法船，送返天庭。法船內備有紙紮必需品，包括船伕、酒、米、鹽、

醋等。化船時用檀香燃點乾禾草，因為要旨是「驅瘟」，值得注意的是用檀香薰，薰香作拜送，而不是用火燒。化船時唸咒：「江頭鑼鼓響鑿鑿，……奉送諸神何處去，……一葉扁舟遊大海，逍遙逕到蓬萊宮。」先把神位放上法船，然後把法船推到龍口向吉方(南方)，同時各經生一路唸咒一路化船，末段結壇唱小讚：「重斟酒三獻，上奉都天拜送瘟司盡上船，為報兒郎並水手，醉歸青天，醉歸青天。」¹⁷ 整個和瘟遣舟的科儀便告完成。

解說 6、與關燈散花儀齊名的香港道教科儀是「大三清」，可說是本地道教科儀的代表作，「大三清」約需四個多小時。「大三清」是道教的大型科儀，包含煉度、超幽和施食三項內容，原名「先天斛食濟煉幽科」，這個科儀「覆蓋全社會」，為普渡一切幽魂而舉行。香港「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儀」的科書，來源於蘇州的《太極靈寶祭煉科儀》，它的基本內容和程式仍然保持著宋代科儀的模樣。¹⁸ 1997年香港道教聯合會舉行慶祝回歸祈福法會，啟建七晝連宵法會，三清科儀由250人一齊誦經，規模譽為「本港開埠以來的首次」。¹⁹

四、送瘟法會所用的《太上洞淵辭瘟神呪妙經》

法會第五天和瘟遣舟，焚化法船，最特別之處是將整篇《太上洞淵辭瘟神呪妙經》（以下簡稱《辭瘟妙經》）經文書錄在法船的帆上。（圖五）「此經為消除瘟疫之用」，借元始天尊為洞淵天尊所說，認為民眾得瘟疫，瘟疫形成因果，皆因「不敬三寶，呵天罵地，全無敬讓，心行詭曲，為非造罪」，應建立道場，焚香誦經以消災。²⁰ 《辭瘟妙經》經文引錄如下：

爾時

元始天尊與諸大眾，在上陽宮內敷演教法。時有洞淵天尊上白

元始天尊竊見下界生民，盡染瘟疫之疾，四肢壯熱，手足酸疼，頭痛眼華，五臟盛熱，迥如鍼刺，不能喫食，如何救療？是時

元始天尊曰，皆是下界生民，處居人世，不敬三寶，呵天罵地，全無敬讓，心行詭曲，為非

造罪，致令此疾所傷。凡為人民身強力健，不知回向，出入往來，並無避諱。蓋是五帝使者奉天符文牒，行於諸般之疾，凡人之所為，係在簿書，遂行其毒，若人吸著，便成此疾。如有男子女人家染此患，宜令闔家斷絕五辛，低聲下氣，柔軟身心，歡喜慈愍；禮謝辭遣，置立香位，請道迎真，於家建立道場，焚香轉誦妙經，依教禮謝開於道位，次施設齋筵，香燈如法。請於天符十二年行病神王、五帝使者、七十二候聖者、二十四炁聖眾、行瘟大判官、佞藥主事、行豬羊牛馬瘟疫使者、祛災使者、癘毒使者、地分神王、后土社令。各領部眾，俱降道場大道之處，解此毒癘，宜轉此經，一時禳謝。若凡人係在簿書，仍須勾銷放赦，奏聞今有弟子某歸依投懇，拜奏誠心，莫為留難，改死重生。於是聖者見此禮謝，收瘟攝毒，故不流行。是時

元始天尊乃為頌曰：

太上立科教 敬信除災殃 瘟疫留毒害 聞善化吉祥 歸依念三寶 家門漸吉昌

芳能轉此經 鬼禍悉潛藏

是時洞淵天尊并諸大眾，聞此聖言，各各歡喜，作禮而退，信受奉行。²¹

以上引錄《辭瘟妙經》，有幾方面須加以解說。

(1) 據李豐楙推測，這部屬於諷誦類小卷經文，在宋元時期撰成，曾被江西南昌、福建漳、泉州道士運用。²²

(2) 在法會道場禮請的對象計有「行病神王、五帝使者、七十二候聖者、二十四炁聖眾、行瘟大判官、佞藥主事、行豬羊牛馬瘟疫使者、祛災使者、癘毒使者、地分神王、后土社令」，經文提到「五帝」，即「東方青帝青瘟神君、南方帝赤瘟神君、西方白帝白瘟神君、北方黑帝黑瘟神君、中央黃帝黃瘟神君」。²³「七十二候」表示一年中節氣的變化，一年二十四節氣，共有七十二候，即《廣成儀制》的〈和瘟遣舟全集〉啟請的「瘟司布化氣候神君」。「十二年王」就是一紀十二年所形成的十二值年瘟王。²⁴

(3) 《辭瘟妙經》收進《莊林續道藏》，稱為《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內容再加演繹發揮。²⁵

五、香港其他驅瘟法會和活動

在 4 月至 6 月之間，港人在疫症下自求多福，不同宗教紛紛舉行祈福法會。4 月 9 日鄉議局邀請新界各區歷史悠久或具規模的寺、觀、廟宇，罕見地同時舉行「全港驅瘟除疫祈福保安洒淨日法會」，為香港禳災祈福，驅除瘟疾，保境

安寧。這 14 所寺、觀、廟宇（宮觀佔其七）包括：²⁶

屯門青松觀

屯門妙法寺

荃灣圓玄學院

荃灣西方寺

打鼓嶺雲泉仙館

大嶼山寶蓮寺

青衣天后宮

青衣真君大帝廟

西貢天后廟

九龍塘省善真堂

粉嶺蓬瀛仙館

大圍信善玄宮

萬德至善社大埔萬德苑

元朗凌雲寺

當疫情嚴峻時，匯集傳統習俗、宗教儀式和民間智慧，或用舞火龍習俗，或求天后、求車公，或在華陀誕求神庇佑。例如 5 月 18 日新界鄉議局在港、九及新界九個地區進行「華陀誕舞火龍鎮疫驅瘟」活動，其中在屯門天后廟舉行的舞火龍活動，不少人向廟旁供奉著的華陀祭壇上香

祈福，祈求神靈保佑非典型肺炎盡快絕跡。華佗寶誕當天，官員在省善真堂參拜華佗仙師，並表揚本港醫護人員的努力。及後 6 月 22 日再於屯門天后廟廣場，再次舞動火龍。經過各方齊心努力抗疫，6 月下旬香港終於從疫區除名。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相對安然渡過，然而居安思危，澳門道教協會與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於 6 月 15 日，舉行「辟瘟鎮炎保平安建醮祈福法會」。²⁷

早在 1894 年粵港發生瘟疫，²⁸ 民眾到本港其他地區或回鄉迎請神祇，如抬著車公、綏靖伯等神像巡遊，以平息災疫。百年前大疫，諸仙聖降示的乩文，勸人修省改過。如《善與人同錄》收錄呂祖乩語：「溯自甲午以來，癘疫四佈，港澳省垣首遭其劫。……其中或能幸免者，……不知天之厚我，而猛然自修省，則癘疫遂潛消之不覺。若從恃天之厚我，而侈然自放，則癘疫一旦發而莫收。」呂祖又乩示：「大劫之中，十今消去七八。更願諸子常存省察之念，恒懷利濟之心，有一分力量，積一分功德。」²⁹ 又如《驚迷夢》收錄黃大仙乩語：「近日治疫方刊太多，無一不能治，亦無一能治。吾之方，只一善字可治矣」，隨壇羊之石詩：「世間盡是善心人，那有遣此瘟神部。」³⁰ 至今仍然發人深省。

後記：本文撰寫過程中，是次法會籌委會成員梁德華道長提出許多寶貴意見，道教文化資料庫與麥錦恆先生提供相關資料和相片，謹此致謝。

註釋：

¹ 萬佛堂門懸牌匾「誠格幽冥」，上款題：「戊午年馬棚火災建醮荷蒙報效超渡亡魂」。下款題：「萬佛堂大道長雅鑒，東華醫院暨闔港建醮值理敬題」。見本人主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頁 97。

² 詳參港九地區六一八兩災超薦法會委員會編，《港九地區六一八兩災超薦法會專刊》(香港：該委員會，1972)。

³ 見本人主編，《道風百年》(道教文化資料庫：利文出版社，2002)，頁 72。

⁴ 〈四十不惑話「六合」〉，載《道心》，第 25 期(香港：香港道教聯合會，2002)，頁 26。

⁵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五瘟使者〉，載湯一介主編，《道書集成》(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第 60 冊。

⁶ 李豐楙，〈行瘟與送瘟〉，《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漢學研究中心，1984)，頁 415。

⁷ 劉仲宇，〈治病和送瘟〉，見蓬瀛仙館道教文化資料庫網頁。

⁸ 詳參劉枝萬，〈臺灣瘟神之信仰〉，《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社，1983)，頁 230-231。

⁹ 詳參王勇，〈端公「打清醮」儀式實錄〉，轉引自劉仲宇，《中國民間信仰與道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 171-174。

¹⁰ 《道法會元》，卷 220，〈神霄遣瘟送船儀〉，《正統道藏》正一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51 冊。詳見陳耀庭、劉仲宇，《道。仙。人》(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頁 166。

¹¹ 四御為北南西東四極之天帝，在道教尊神中地位僅次於三清；五老是隨五行所生的五靈五老真君。

¹² 飛雁洞佛道社編，《福報》，第 15 期，2003 年 5 月 14 日，頁 1。

¹³ 《玉樞經》全稱是《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

¹⁴ 參考《福報》，第 14 期，2003 年 4 月 17 日，頁 1。

¹⁵ 陳耀庭，〈「關燈散花」儀的內容和形成〉，見氏編，《道教儀禮》(香港：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2000)，頁 261、頁 263-264 和頁 274。

¹⁶ 竹林仙館曾忠南道長訪問，2001 年 7 月 5 日。

¹⁷ 《廣成儀制》，〈和瘟遣舟全集〉，頁 7，收入《藏外道書》，儀範類。

¹⁸ 陳耀庭，〈「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儀的歷史形成和思想內容〉，見氏編《道教儀禮》，頁 247-248 及頁 254。

¹⁹ 《香港道教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祈福法會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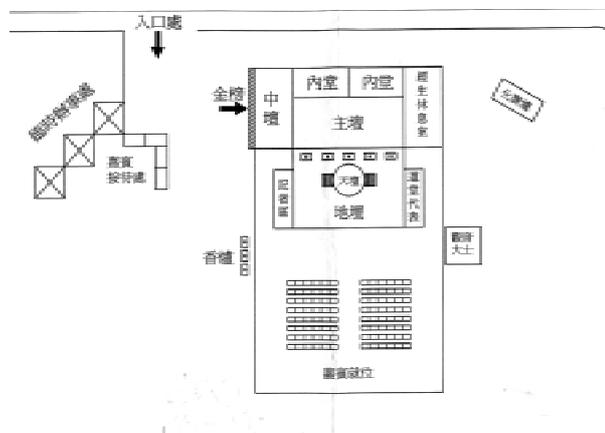
- 與共識場刊》(香港：慶回歸籌備委員會文書組，1997)，頁 20。
- ²⁰ 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43。
- ²¹ 收入《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第 2 冊。
- ²² 李豐楙，〈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 期，1993 年，頁 32-33。
- ²³ (宋)寧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七「瘟疫醮神位」，收入《正統道藏》，洞玄部威儀類，第 12 冊。
- ²⁴ 李豐楙，〈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頁 34-35。
- ²⁵ Michael Saso 編輯，《莊林續道藏》(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 4 部，小法，卷 25。
- ²⁶ 《文匯報》，2003 年 4 月 8 日廣告。
- ²⁷ 《澳門日報》，2003 年 6 月 1 日報導。
- ²⁸ 1894 年香港大疫，可參《申報》等文獻，見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香港：三聯，1998)，頁 820-833。
- ²⁹ 《善與人同錄》(1912，辛亥年十一月初七)，頁 340 及頁 286，詳參志賀市子，《近代中國のシャーマニズムと道教》(東京：勉誠出版，1999)，頁 223-227。
- ³⁰ 《驚迷夢》二集，戊戌閏三月初六(1898)，香港普宜壇 1991 年重印，頁 32。



圖一、「消災解厄祈福法會」會場，相片後方為車公廟。(道教文化資料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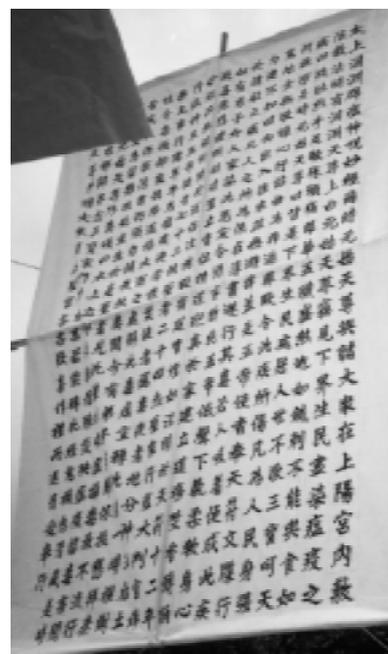
圖二、用作和瘟遣舟科儀的法船（作者攝）



圖三、「消災解厄祈福法會」會場平面圖



圖四、法會期間派發的驅瘟符與平安符



圖五、書錄在法船帆上的《辭瘟妙經》（作者攝）

澳門的疫症與廟宇

陳國成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2003年2月9日，澳門柿山哪吒廟舉辦了「癸未年祈福法會」，祈求澳門免受「非典型肺炎」侵襲。同年的6月15日，大三巴哪吒廟有鑒於鄰近地區受「非典」疫症困擾，澳門亦出現一宗病例，為求哪吒保佑，遂舉行名為「辟瘟鎮炎保平安建醮祈福法會」。該兩次祈福活動均由澳門道教協會主持科儀及祭祀儀式。其實，類似的民間集體祝願行動／儀式早見於光緒十四年(1888)的霍亂疫症及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鼠疫，而這兩次疫症更造就了位於三巴門福慶街的包公廟以及大三巴哪吒廟的建立。本文以1888年、1895年，以及2003年這三次疫症來探討澳門民間社會建廟防疫、祈福保安的情形，從而展示宗教在防疫消災所扮演的角色。

一、1888年的霍亂疫症與包公廟

1885年，澳門政府在憲報上公報當地「疏疏間有嘔吐之症耳」，而「華人多有染者，但思其所由來，乃因飲食不調，居住不潔。」¹由於政府加緊預防傳染工作及提供診症之法，因此使得該疫症並未廣泛流傳。但到了1888年的8月16日，運載葡萄牙軍隊的「印度號」途經香港而抵達澳門，由於當中有士兵從香港感染了霍亂，政府於是在船隻停泊地方設為隔離區，「嚴行設法，不使與別人相通，料不能傳染」。²但後來負責隔離工作的一名少校因染上霍亂，其後更因併發症而死亡，政府於是進一步加強對抗疫症，在青州、氹仔以及該船停泊的地區搭建檢疫站。當年政府報導澳門約有500多宗霍亂，而死亡個案亦多達30多宗。³民間對疫症的態度，除了依照政府的指示改善個人環境衛生以及染病後從速醫治外，訴諸以超自然力量來清除疫症的思想亦應運而生。當時居住大三巴地區的居民建議迎請包公神像出巡，藉其法力以保坊眾平安。居民之所以選擇包公，有傳在清光緒年間，有一位居住於該處

的老婦人，她從佛山迎接該包公神像至澳門家中，而當時向其祈求問卜的信眾，他們的訴求均獲靈驗。因此，適逢疫症流行，有居民便建議包公出巡，為當地辟疫祈福。⁴恰巧，當時疫症亦開始消退，居民因此深信包公的神力，故倡議集資為其建廟，以資供奉。

包公廟由創建至完成，只花了一年時間。該廟為二進建築，廟內有一塊立於光緒二十二年的「憲諭遵守碑」，記述了當年的情況：「上天降疫，人心悽惶。茲我三巴門合街善信，叩稟上天，恭請包丞相座鎮保安，藉賴神靈顯赫，法雨宏施，合街老幼，均沾德澤，海國安瀾。」碑文亦記載了在當年合共有19人，以劉直為倡建廟宇之首，向澳門政府取得該廟地段為廟址，並准免納各項租稅。倡建值事包括：劉直、歐相、劉進、祥合店、德合店、怡利店、趙合店、鄭勳、黃養、趙玉、馮益、同盛店、同利店、泗源店、同和店、永利、范和記、祥興店和江利店等。建廟資金「係闔澳各街各鋪戶簽題」，而「該廟完建，共支各項工銀一千六百餘元」。⁵廟宇建成後，每年均建醮演戲，並由當時推選的値理統籌。廟內三幅匾額，記載了當時建醮演戲的値理名單。由於建廟的經費主要來自商舖，因此管理廟宇及建醮演戲等事亦以商舖為名義的代理人所執掌(見以下的附錄)。時移勢易，由60年代開始，因受當時國內對宗教視為迷信的思想所影響，再加上缺乏經費，神功戲便開始停演。

附錄(建醮演戲的値理名單)

1. 光緒七年

萬和號、昌利號、恒益號、福隆號、福來居、裕安祥、劉進記、合成號、匯生號、興隆號、南順號、遠記號、德全號、文和號、新彩號

2. 光緒二十年

廣同新、金菊園、怡盛和、公信和、江利和、永悅隆、裕昌號、福興號、怡興號、興記號、常豐號、楊兆記

3. 光緒二十一年

萬泰店、廣口店、永祥店、寶華店、成隆店、德棧店、元記店、茗香館、如意棧、新天和、廣隆店

二、1895 年的鼠疫與哪吒廟

1894 年香港發生鼠疫，死亡枕藉，但當時仍未波及澳門。雖是這樣，澳門政府對這種疫症並未掉以輕心，立即頒佈了 11 條辟疫章程，⁶ 力圖阻止香港流行的鼠疫蔓延到當地。當年的 9 月，澳門政府仍指出「現今本埠以及陸地各處均仍屬安靜如常，並無各項疫癘也。特諭。」⁷ 但數月後，鼠疫終於傳入了澳門。《鏡海叢報》1895 年 5 月 15 日報導：「去歲冬間復傳至澳，春夏之交，其勢頗熾……前禮拜內，澳中各妓寮尚覺照常安靜，今則奔徙將空，十家九閉其門。新圍一巷，全行遷去。福隆新街僅留四五家。」⁸ 該報在 7 月 3 日再指出：「……病者數人，繼而日歿者數十人……於是人心惶惶，各自為計……因此遷回鄉者有之，遷往港者有之，遷去省者亦有之。其不能離澳而家資殷實者，亦以舟作陸……每當夕陽初落，樓閣上燈，則店皆閉戶，路少行人，市情之淡，為數十年來所未睹。」雖然後來疫症得以平息，但在該次流行傳染病中有二萬多人死亡，其中華人佔大多數，災情可謂相當悲慘。⁹

其實，當疫症還未在澳門爆發時，政府已聚合當地華人紳商組成一公會，以整頓、督促華人社區的環境衛生。¹⁰ 但無奈疫症最終仍肆虐當地。在流行疫症期間，華人除了不斷改善個人及居住環境衛生，有些商賈更成功向「華政乞得三夜情，虔奉綏靖伯巡行街道，聞神已兆語，定于二十日澳地平安云。」¹¹ 約半個月之後，「以故澳中紳眾，擬將日前所迎接綏靖伯及各仙靈，再在澳中巡行三日，擇於十六日奉駕還宮，酬神報

惠。」¹² 綏靖伯原名陳仲真，廣東人，在南宋時任屯田校尉，善於緝拿盜賊，但後來為盜賊毒死。他死後顯靈，使盜賊們互相殘殺，因而使地方回復平靜。當地鄉民遂建廟供奉，而朝廷亦追封他為綏靖伯。當年香港鼠疫流行時，當地四邑人士從新會的綏靖伯廟請他到來鎮壓瘟疫，¹³ 因此，不難理解澳門的居民亦希望透過對綏靖伯的祈福及出巡來消除疫症。

在疫症期間，同時又有居住於大三巴地區的居民向鄰近的柿山坊眾商議，擬請柿山的哪吒廟的哪吒神像分身到大三巴供善信參拜，但建議遭到反對。雖然雙方曾多次商議，但亦未有成果。最後，大三巴居民自行建廟供奉哪吒。¹⁴ 該地居民之所以希望得到柿山哪吒神靈庇祐，可能與以下這個原因有關：根據《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指出，「正值當年澳門發生疫症，只有柿山一帶沒被波及，當這個消息被傳開後，眾人均到柿山祈求福安，聲威更為一時無兩。」¹⁵ 而且，再加上以下這個有關哪吒的神諭，居民對他除疫的神力更深信不疑：「百多年前，澳門曾發生一場疫症令居民生活苦不堪言，特別是大三巴區之貧民有如水深火熱之中，由於當時生活清苦，在無計可施之下惟有當天祈福求有奇蹟出現得以打救，而當時有一位善信在睡夢之中看見一孩童從天而降，腳踏風火輪，向岸前對面之山溪水施法，著其取水飲用便會痊癒，並叮囑他通知鄰居飲用，都一一痊癒，當時隔鄰居住很多葡人聽聞都來取水試用，都稱奇痊癒。」(故事內容來自大三巴哪吒廟祈福辟瘟法會所派發的場刊) 有趣的是，據柿山哪吒廟今屆值理會執行主席鄭權光先生指出，相傳當年柿山居民是將哪吒，還加上金吒和木吒三神像一同借予大三巴的居民，而且在多次催促下他們只將哪吒的神像歸還，這解釋了為甚麼現在的柿山哪吒廟只供奉哪吒一神，而沒有金吒和木吒。因為這一事件，令兩廟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一定的芥蒂。但無論如何，大三巴哪吒廟正因為這場瘟疫而誕生的。該廟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位於舊城圍牆之茨林圍入口旁，居民對哪吒的庇佑的懇切期望可見於廟內的兩對匾聯：

1. 廟貌宏開新氣象，神靈廣庇福無疆。
2. 厚澤宏施長流鏡海，深恩廣播永庇蓮峰。

在同一年，柿山哪吒廟亦完成擴建工程，使昔日建於一小塊麻石上的神龕擴展為一所較具規模的小型廟宇。至於神龕建於何年，則無具體資料作証，但於重修擴建古廟時所立石碑《倡建柿山古廟建亭勸捐小引》中指出：「柿山古廟，倡自清初」，而其中一對刻於石柱上的楹聯亦表示：「二百餘年赫聲濯靈澤敷蓮島，數千萬眾報功崇德亭建柿山」，可見該古廟已有悠久的歷史。

農曆五月十八為哪吒誕期，柿山及大三巴哪吒廟亦分別舉行賀誕活動，所須費用主要來自善信的捐獻。1898年的澳門憲報記載了柿山哪吒廟當年籌募賀誕經費所遇到的困難及應對的方法：

茲我柿山哪吒古廟二百餘年，一坊香火，闔澳拜參，地潔神靈，年中神誕費用多金，奈無嘗業難以躊躇，目見神功冷淡，年不如年。今闔坊公議將本廟司祝開投，每年價銀二百大元為底，連投三年為期，價高者得。先交押票銀十大元，若投得者，將押票銀作為按櫃，尾年扣除，其租銀分四季交納，先交上期一季，方得開辦，准五月初一日開投，特此預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吉旦。柿山圍當年值事楊兆英等啟。¹⁶

為甚麼在廟宇擴建當年竟出現這種情況？推想的原因可能是瘟疫對當地經濟所造成的傷害還未復原，而籌建古廟早已將民間能籌集的資金耗盡不少(當年合共籌得六佰伍拾多元)，因此出現了以上的情況。對於是次賀誕的情形，筆者並沒有資料探討，但從以後的文獻記載，哪吒廟並未因此事而影響了其後舉辦的賀誕活動，例如廟中的一塊木匾詳細記載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建醮演戲的支出以及民間的捐獻，從眾多支出項目以及花費的金額反映了當年慶賀活動相當具規模。

兩所哪吒廟的管理都是由坊眾推選出的值理負責，然後由他們向信眾應捐賀誕款項，以支付活動的開支。賀誕節目除了上演神功戲及搶炮外，還有哪吒太子出巡，用以淨化社區，驅除邪疫，並祈求風調雨順，安定繁榮。《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記載了數十年前抬神出巡的情況：

這裡所說之抬神，是指抬著哪吒太子行宮出巡遊街(正式的八人大轎)，抬神者均需「花仔」(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歲之未婚男子)。轎的前後均由四人抬著，兩旁則由兩人扶轎。行最前的有兩位身穿唐裝長衫。跟隨行宮而行的，分別有幾位擔著花籃、擔著水桶的八、九歲小孩。另外有幾位三、四歲小男孩當「哪吒仔」，亦有幾位六、七歲小女孩當仙女(仙女散花)。他們均站到大人(成人)之肩膀上；還有年紀較大的男孩負責「灑聖水」。當鑾輿隊伍出巡遊街時，其所經之路徑上空，不能有衣物遮擋著行宮，如果未能把衣物收起的話，隨團的其中一位老街坊使用「長鴉叉」把它「叉」下來。而在大隊前，有幾位長者手持著肅靜、迴避的牌匾帶頭開路。同時還有結義堂醒獅作先鋒。每當行經其他廟宇時，都要鞠躬三拜，以前行、退後、來回做三次，以作敬禮。

但是，特刊沒有提及出巡的路線及所需的時間；至於以醒獅作先鋒的結義堂，它是成立於1922年的花炮會，會所設於哪吒廟旁邊，在賀誕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神輿是該廟擴建時所造的，雕刻漆上金箔，而其頂部則以重疊安裝而成。時至今日，哪吒廟出巡仍然是賀誕的重要一環，但抬神的不再規定是未婚男子，而扮演「哪吒仔」及「仙女」的小朋友亦再沒有站在出巡隊伍成員的肩膀上。至於巡遊的路線，近年主要包括以下地方：哪吒廟→白馬巷→水坑尾→八角

亭→新麗華廣場→新馬路→板樟堂街→女媧廟→賣草街→柿山斜巷→哪吒廟。筆者不知道這百多年間巡遊路線是否有很大的變化，但從以上的路線可以清楚反映出巡遊的範圍，主要是以柿山社區為核心，並未涉及澳門其他的主要社區如南灣、西灣(兩處均為高尚住宅區)以及內港(由媽閣廟至關閘一帶)周圍等地華人社區。

三、2003 年疫症與祈福大會

2002 年年底，廣東開始出現「非典型肺炎」疫症，其後更向鄰近地區蔓延。當澳門仍未出現感染個案時，民間社會已自發動員舉辦祈福消災的宗教活動來抗疫。柿山哪吒廟鑒於它過去在抗疫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地位，所以再次在同類型的宗教儀式上擔當首要的位置。是次名為「癸未年祈福法會」係由該廟值理會與澳門三盞燈聯合商會合辦，並得到居民的資助，希望通過一系列的道教科儀及祭祀儀式(包括上供、上表、禮斗、朝幡、施幽等)為澳門居民祈求消災解厄，並同時派發平安米、神茶及平安符予到場善信。雖然這是該兩組織第二年的合作，但是次祈福法會在這種情況下舉行而所帶來的意義更為民眾所認同。

兩個月後，澳門出現了首宗感染個案。其後，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在坊眾的支持下動員舉辦了「辟瘟鎮災酬恩法會」，為澳門以哪吒廟名義籌辦的第二個祈福消災宗教活動。在 6 月 15 當天的早上，值理會成員在道士帶領下將哪吒神像請到神棚安放，為繼後的開壇及嘉賓上香儀式作準備。接下來的儀式計有放生、上表、發送關文、朝幡、朝大是、禮斗，以及施幽。以上所進行的儀式，在廣東地區的打醮活動中是常見的。至於當天下午舉行的祈福轉運儀式(參與信眾以神壇為中心繞三圈)，約有 300 多人參加，而派發的平安米、神茶及平安符多達數百包。另外，在 6 月 17 日哪吒誕當天，值理會特別應丞仔居民的要求，將以往哪吒出巡只限於澳門範圍的路線延伸至丞仔，希望當地坊眾亦受其庇佑。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政府對於這兩次的祈福活動都沒有作出任何的資助或參與。根據柿山哪吒廟值理會鄭先生指出，政府對以民間宗教作為

防疫消災的行動是採取保留的態度，但這並不表示政府完全不支持中國傳統習俗及其相關的慶賀活動，特別是神功戲及巡遊活動，這從文化局及旅遊局的資助得以證明。另外，政府對中國民間宗教有關燃放炮竹這項必不可少的環節亦採取了一種非常容忍的態度(與香港政府所採取的大大不同)，甚至在 1894 年為了展開防範鼠疫工作而自動暫時停止燃放炮竹的禁例：¹⁷

大西洋澳門議事公局紳長巴，為通知事照得查本局稟冊，西紀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八月初二日暨二十三日所載燒放炮竹一節，今暫行弛禁，為此佈告本澳華民人等知悉，無論日夜何時，均可燃燒炮竹，至復行禁止之時為止，特此通知。甲午年四月二十九日。

有趣的是，澳門政府對燃放炮竹所採取的容忍態度(尤其是民間慶賀新春及其他節誕時)，已成為當地居民解說「非典型肺炎」於年初沒有在澳門出現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他們相信燃點炮竹時所釋放的硫磺，已將可能存在於社區的那種病毒殺死。故此，這加強了民間對祈福活動、燃放炮竹等來消除疫症的意願及支持程度，尤其是被視為消災去疫至為靈驗的哪吒神亦包括在供奉的行列之中。

四、小結

包公廟及大三巴哪吒廟的建立見證了澳門民間社會對抗疫症的歷史，而 1895 年的鼠疫災難則透視了柿山哪吒廟與大三巴哪吒廟的關係。這集體歷史記憶在百多年後遇上「非典型肺炎」的今天，通過所舉辦的消災除疫宗教活動而給予喚醒(雖然包公廟沒有籌辦同類型的祈福法會，但它仍是這集體記憶的一部份，並通過它們而被轉錄下來)。同時，這兩間哪吒廟亦因此而在澳門社會中再次獲得(或獲得更多)居民的認同及支持，進一步提昇它們在防疫、抗疫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

註釋：

- ¹ 《澳門憲報》，1888年第33號，轉引自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頁135。
- ² 同上。
- ³ *Baletin Oficial*, 1888, p. 328。
- ⁴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頁81-82。
- ⁵ 《澳門憲報》，1896年第45號，轉引自湯開建等，《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56。
- ⁶ 有關條文，可參閱《澳門憲報》，1894年第22號，轉引自湯開建等，《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30-231。
- ⁷ 《澳門憲報》，1894年第35號，轉引自湯開建等，《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37。
- ⁸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頁499。

⁹ *Baletin Oficial*, 1895, p. 427。

- ¹⁰ 《澳門憲報》，1894年第23號，轉引自湯開建等，《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33。
- ¹¹ 《鏡海叢報》，1895年5月15日，轉引自湯開建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頁500。
- ¹² 同上，1895年6月5日，頁509。
- ¹³ 游子安，〈上環華人住宅區與太平山街廟宇〉(未出版)，頁3。
- ¹⁴ 唐思，《澳門風物志》(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12。
- ¹⁵ 《澳門柿山哪吒古廟擴建百年紀念特刊》，頁2。
- ¹⁶ 《澳門憲報》，1898年6月18日第25號，轉引自湯開建等，《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頁278。
- ¹⁷ 《澳門憲報》1894年4月，轉引自《澳門日報》，2003年8月6日。



圖一、建於1898年的大三巴哪吒廟



圖二、1953年柿山坊眾子女參與哪吒巡遊活動(相片由柿山哪吒廟值理會提供)



圖三、1953年花炮會成員參與抬神活動(相片由柿山哪吒廟值理會提供)



圖四、昔日大三巴哪吒廟哪吒出巡途經新馬路一帶地區



圖五、2003年柿山哪吒廟哪吒出巡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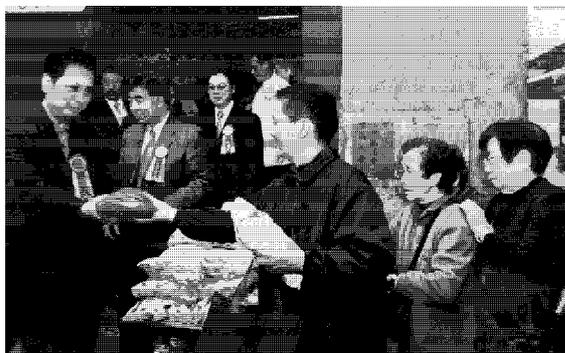
圖六、小童扮演哪吒參與出巡



圖七、居民參與「祈福轉運」儀式



圖八、1898年擴建的柿山哪吒廟



圖九、居民到柿山哪吒廟領取平安禮包 (內有米、茶葉、及靈符)



圖十、包公廟：坐落鏡湖醫院左邊的福慶街

有關 1932 年廣州霍亂疫症的報章資料介紹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研究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疫症史，尤其是社會各階層對疫症的處理，報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本文以民國時期廣州的重要報章《越華報》¹為例，介紹 1932 年報章上所記載的廣州霍亂疫症。通過這些資料與本期的其他文章相對照，應可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社會對疫症處理方法的延續與變遷。

1932 年 6 月，廣州爆發霍亂，疫情極為嚴重，當時有廣州人說，這是繼清末鼠疫後死亡人數最高的一次疫症。²在 1932 年 6 月 6 日的《越華報》上，刊載了第一篇有關廣州霍亂的報導。³自此一直到 7 月初，報章上有關霍亂疫症的記載甚多，當中包括政府的防疫措施、病者的染病及死亡過程、死亡人數的統計、疫症擴散的情況、聲稱可醫治霍亂的醫藥廣告、以及不同社區以宗教儀式驅疫的記載等等。

當時接收病者的主要是位於廣州盤福路的城西方便醫院，此醫院為慈善團體，於清末由廣州商人興辦。根據當時衛生局的調查，由 1932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24 日，方便醫院收進 613 人，當中有 267 人死亡（仁濟醫院收進 34 人，全部死亡；其餘各醫院收進 237 人，死 64 人）。⁴另有報導提到由於死者眾多，棺木不足的情況：「長生店存貨一掃而空，為應急起見，特乘夜開工，伐木聲與舂桐油灰聲相應和，板價飛漲，且每尺加工二元」⁵；「常與方便醫院交易之某某長生店，其製便之四方板，與六楞仔[作者按：或稱六零，為貧者所用的棺木]，一時售罄，夤夜開工趕製，異常忙碌，其在霍亂最多之地點，如上西關之帶河路，及河南之鳳凰等處之長生店，所製便之長生，已無存貨，幾至於絕市。」⁶因求過於供，棺木售價飛漲，本來五十元的棺木漲價至八十多元，且質素「劣陋不堪」。⁷

而政府對遏止疫症又有何措施呢？由於霍亂病菌由不潔的食物及食水傳播，衛生局下令禁售

魚生、雪糕、剉雪涼水、涼粉等生冷食物，以及禁止擺賣切開及腐爛的水果。⁸社會局向公眾印發傳單，解釋霍亂的成因及傳播途徑。至於防止疫症蔓延的方法，除了注意食物清潔外，宣傳單張亦強調消毒的重要，指出病者的衣物要以消毒水浸透，或是把其燒掉。病者居住的房間，要以臭水臭粉（作者按：即阿摩尼亞）或石灰熏洗，病者的糞溺嘔吐物，則以同樣的消毒物料掩蓋。公安局則聘請醫師贈施預防霍亂血清注射（但報章並沒有提供接受血清注射的市民的數字）。⁹

雖然當時對霍亂病菌的傳播方法有一定的了解，但以何種方法醫治霍亂，似乎仍莫衷一是。在 6 月中開始，報章上陸續出現不同的藥方和藥品（例子見附圖），最匪夷所思的，應是方便醫院一名董事公布的藥方：「以亂紗（即織造線衫線襪所餘之尾紗俗名紗屎，又即機器工人常用以拭抹機器傷油者，名為威士之物）少許，置新瓦上煨之成灰，以碗盛載，用滾水沖服，病即霍然而愈。」¹⁰而既然當時未有公認有效的方法應付，應用報章上這些藥方或藥物的市民自然不少。

而衛生局則分別向西醫公會及中醫公會致函，要求他們召集同人開會討論治療辦法，並把討論結果公布。若比較這兩封信函，可以看到衛生局對西醫的偏好。在發給西醫公會的信中，衛生局認為「醫學進步，日新不已，貴會同人日醫診治病人，對於此症經驗所得，諒必有獨到之處...」而在發給中醫公會的信則指責的意味較濃，信中指報章上刊載不同的藥方，「有市民信之不疑，事前恃為護符」，而中醫公會既為「中醫學術研究機關，負有斟一指導之責...」¹¹雖然衛生局似乎對西醫療法較有信心，但作為當時廣東省最高管治者的陳濟棠，向醫院提供了一道藥方，以表示對民眾的關心，而此卻為中藥藥方（這除了反映陳濟棠對中醫的偏好外，相信亦是

由於當時中藥較西藥廉宜，且容易買到）。報導指此藥方是他與醫學界共同研究的，他更派人把藥散 4 大包共 20 斤送到方便醫院救治病人。藥方的服法是「先以灶心坭五錢煲水，煲妥後澄清取水，和勻藥散一兩服食。」報章沒有說明藥散的成份，只是說「病者服後亦有效。」¹²

而在報章中，亦有不少是有關民眾通過民間宗教信仰和儀式來驅疫的報導。有不少社區或遊神、或請來道士作法驅疫。例如在 6 月初已出現霍亂疫症的河南鳳凰崗，居民請了華佗（東漢時代的名醫），於 6 月 13 日舉行遊神。¹³ 出巡之日，有華佗符售賣，每度符售 3 仙。該處的居民亦在門外插上柳枝及玉皇大帝都城隍司等小黃旗。¹⁴ 而小北的東嶽二約，居民亦請了東嶽神出遊。參與遊神的居民齋戒沐浴，及清洗神像，於 6 月 26 日啟程，「前導色馬鑼鼓，旗幟飄揚，東嶽之後復隨龍母，以某館醒獅殿後，由越華正南兩路而轉入各街，交通為塞，店戶盛設香案，供鮮花，爆竹之聲，一時震耳。」¹⁵ 而一些社區則延請道士到社壇驅疫。如河南寶龍大街舉行的驅疫法事，道士「身穿大紅八卦袍，手持叮叮，立在社前，大喃特喃」，另有道士沿戶分派符籙。而村民則陸續向社壇跪拜。¹⁶ 報章在報導驅疫的宗教活動時，大都是以「科學」、「衛生」的角度，批評這些儀式是「文明社會之玷」，譏諷「人民知識淺陋」。然而，不少報導亦指出疫症蔓延極為迅速，很多病者未及送到醫院已死亡。當醫生對如何治療此疫症仍莫衷一是，當「科學」、「衛生」似乎都未能緩和疫症的威脅時，民眾惟有通過宗教儀式來克服對疫症的恐懼。

本文以《越華報》為基礎，展示了 1932 年廣州霍亂疫症中政府以及民眾對疫症的處理。現今，政府是擔當公共醫療衛生最重要的機構，而由於政府掌管了社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處理疫症，亦只可能由政府作統籌，民間作配合。而在 1932 年廣州的霍亂疫症中，可見政府已初步介入公共醫療的範疇，如取締不潔食品、提供疫苗、向公眾宣傳防禦疫症的方法、以及敦促中醫及西醫工會商討醫療方法等等。然而擔當了更重要的醫療角色的，卻是方便醫院這所慈善機構。至於

廣東省最高統治者陳濟棠，向方便醫院提供 20 斤藥散，似乎已盡了其施行仁政的道德責任。

當霍亂疫症於十九世紀在歐洲初次出現時，影響了西方多個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亦衝擊了當時的社會秩序。¹⁷ 要了解 1932 年廣州的霍亂疫症，在近代中國疫症史上有何重要性，對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實踐以至社會秩序又有何長遠的影響，則需要與其他資料結合，以作深入的研究。

註釋：

¹ 根據粵海關的資料，在 1930 年代初，《越華報》每天發行 7,000 份，是廣州發行量最高的日報。官方報章《廣州民國日報》的發行量則是 5,000 份，與《公評報》及《市政日報》並列第二位。見〈粵海關十年報告，1921-1931〉，《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121。

² 〈霍亂症與商業之影響〉，《越華報》，1932 年 6 月 21 日，頁 5。

³ 〈本市發現急性霍亂症〉，《越華報》，1932 年 6 月 6 日，頁 5。要注意的是，現存的《越華報》縮微膠卷中，193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這數天的報章並不齊全。

⁴ 〈本市霍亂症最近調查〉，《越華報》，1932 年 6 月 26 日，頁 5。

⁵ 〈霍亂聲中之見聞〉，《越華報》，1932 年 6 月 28 日，頁 1。

⁶ 〈霍亂流行中之面面觀〉，《越華報》，1932 年 7 月 15 日，頁 1。有關當時廣州人所用的棺木的資料，可參看 1948 年 5 月 30 日刊於《越華報》的〈購棺木亦需港幣〉，當中提到富有人家用「汀洲沙板」，貧者則用「六零」或「四方箱」。

⁷ 〈霍亂症與商業之影響〉，《越華報》，1932 年 6 月 21 日，頁 5。

⁸ 〈布告取締飲食品規則〉，《越華報》，1932 年 6 月 12 日，頁 5。

⁹ 〈本市霍亂症最近調查〉，《越華報》，1932 年 6 月 26 日，頁 5。宣傳單張如此解釋霍亂病菌的

傳播途徑：「係由一種細菌從飲食上器物上所傳授，若多飲食不潔之冷水或腐爛食物或未經沸口煮熟之食物，或因在上流水源處洗滌病者之衣服器皿，而在下流處接飲其水液或用之洗浸果菜，或因接觸病者太近粘染病者之噴嚏涎沫，或接觸病者之衣服食物器皿後未經嚴密之消毒，或接近病者之糞溺或食物之渣滓偶而粘及自己唇舌等處時，在在皆可染得斯症，惟並非由呼吸得來」。

- 10 〈預防霍亂症簡明辦法〉，《越華報》，1932年6月14日，頁5。
- 11 〈本市霍亂症最近調查〉，《越華報》，1932年6月26日，頁5。
- 12 〈陳總司令製送霍亂散〉，《越華報》，1932年6月28日，頁6。
- 13 〈可祝乘病斂財之手段〉，《越華報》，1932年6月21日，頁1。

- 14 〈鳳凰崗鄉驅疫怪聞〉，《越華報》，1932年6月28日，頁1。
- 15 〈東嶽出遊紀〉，《越華報》，1932年6月30日，頁1。
- 16 〈霍亂流行中之迷信舉動〉，《越華報》，1932年6月25日，頁1。
- 17 有關的研究不少，例如 Francois Delaporte, *Disease and Civilization: The Cholera in Paris, 1832*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Geoffrey Bilson, *A Darkened House: Cholera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ada* (Buffalo, N.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R. J. Morris, *Cholera 1832: 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6); Geoffrey Gill, Sean Burrell, and Jody Brown, "Fear and Frustration—the Liverpool Cholera Riots of 1832," *The Lancet* (Jul 21, 2001): 223-237.

附圖：《越華報》中有關霍亂的廣告。見《越華報》，1932年6月15日，頁1。

會機失勿送不期過止底月五曆夏至送限紙央中收全打五上買一送一買丸健坤科婦丸武精名蓉益謙梁

霍亂症救星

功奇之生回死起有痛肚嘔病痧脹絞筋抽離霍治專散此取不文分人教在志業其亂霍送散益謙梁佛港省

▲總批發▼
廣州一德中路 廣州南關拾沙
香港大道西 歐家全藥房

快服——全心牌
濟世水 卽救
此濟世水專救霍亂抽筋
嘔吐痛時疫急症痛症
每瓶一角 每打一元
中外各埠 均有代理
(善團採購)
(特別優待)

痧症狂於虎

香港歷史檔案館館藏照片介紹¹

香港歷史檔案館

要了解過去，圖像資料的價值並不比文字資料低。而隨著十九世紀攝影機的發明及攝影技術的普及，照片成為記錄過去的一種極為重要的圖像資料。香港歷史檔案館館藏照片頗豐富，其中約八千餘幅照片的數碼影像已於 2002 年 10 月開始，供公眾人士在檔案館網頁 (<http://www.hkpro.gov.hk>) 上瀏覽。² 公眾人士在該網頁先按「目錄搜尋」，再按「照片」便進入「照片線上目錄」，然後可利用關鍵字、標題（中英文皆可）或年份尋找所需照片。如檔案館有相關的照片，網頁會列出有關照片的基本資料（包括參考編號和照片說明），公眾人士可進一步按鍵，從照片清單中即時查閱個別照片的詳細資料，如該照片有數碼影像亦可即時閱覽。有關檔案館照片的類別，本《通訊》已曾經介紹過（參看《通訊》第 10 期，〈香港歷史檔案處館藏照片與「香港·上海城市發展檔案圖片展」〉），以下集中對館藏照片的內容作簡要的介紹。

歷史檔案館所收藏的照片中，最早期的約攝於 1860 年代。由於香港島北岸在 1842 年後成為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經濟及軍事中心，亦為西方人士聚居之地，因而早期的照片主要是香港島北岸及中區一帶的建築物，例如港督府（現禮賓府）、三軍司令官邸（即旗杆屋，今茶具文物館）、域多利兵房、聖約翰座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灣仔及銅鑼灣（東角）附近的洋行貨倉、香港會所、木球場、快活谷馬場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約二十幅攝於十九世紀末的港島照片，可以找到於 1971 年以相同角度拍攝的照片作對照，當中的變化頗為有趣。另外，有數幅從 1880 年代到 1970 年代，於不同時期以相同角度拍攝的歌賦山（Mt. Gough），隨著山上的西式住宅逐漸增多，山的輪廓亦出現了變化。透過這些新舊照片的對比，近百年來香港島面貌的變遷便一目了然。

九龍半島及新界區的照片拍攝的年份相對較

晚。雖然位於九龍半島南端的尖沙咀及油麻地一帶，在 1860 年代及 1880 年代已相繼見諸於館藏照片中，而九龍寨城亦有不少攝於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照片，但十九世紀九龍半島其他地區拍攝的照片始終不多。至於新界地區，早期的照片主要是有關 1899 年港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 1898-1903 出任港督）到新界與當地紳耆會面，及新界勘界委員會的勘界情況。而二十世紀初的新界照片所拍攝的，很多都是在香港的西方人到上水及粉嶺一帶進行狩獵及高爾夫球活動的情況，又或是羅湖及粉嶺軍營的面貌。有關新界華人活動的照片較少。

歷史檔案館收藏的照片集中，其中一輯是駐守香港的蘇格蘭近衛隊第二營（2nd Battalion Scots Guards）的照片集，以往較少受注意。照片攝於 1927 及 1928 年，其中有約十幅是大埔、上水及粉嶺村落的照片，包括大埔頭、大埔尾李屋及河上鄉等。同一輯照片集中亦有獅子山山腳的村落、深水埗的製帆船工場及荔枝角美孚行油庫的照片。這些照片可幫助我們了解 1920 年代九龍及新界村落以及工業發展的面貌。

而館藏的照片中，特別具有參考價值的是一批私人捐贈的照片冊。由於照片的來源可以確定，我們可比較肯定照片是由哪些人在甚麼情況下拍攝，這有助了解照片的內容及所反映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捐贈的照片冊中有六百多幅照片，由港督梅含理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 1860-1922）的女兒捐出，當中大部分是梅含理爵士於香港出任布政使（1902-1910）及港督（1912-1919）期間拍攝的照片。照片不單攝下了梅含理爵士出席官方活動的情況（如快活谷賽馬會、英皇佐治五世登基的慶祝活動、九廣鐵路英段的啟用禮、紅十字會的籌款活動等），還記錄了他的家庭生活（到新界及淺水灣郊遊、到深水灣及粉嶺進行高爾夫球活動等）。照片冊亦有香港的風景照，例如是 1912 年的將軍澳照片，及 1916 年長洲海邊

及北帝廟的照片，相信是現存將軍澳及長洲最早期拍攝的照片之一。

個人捐贈的照片冊，除了有香港早期的照片，也有華南地區的照片。例如其中 1 冊照片冊，有二十多幅由法禮著 (A. G. M. Fletcher) 攝於 1903 年廣西省災荒的照片。法禮著於 1902 年抵港為官學生 (government cadet)，其後在 1916-1925 年署任布政使。1903 年，廣西發生災荒，他被派往南寧、貴縣 (今名貴港) 及桂平縣等地施米。在照片中，我們看到等待施米的大批民眾、死去的災民、還有一對瘦骨嶙峋的孿生小孩在喝救援人員餵給的煉奶。這些照片對我們理解二十世紀初華南地區的天然災害和社會動蕩都具參考價值。

在研究時利用照片，我們應注意照片是在甚麼環境下拍攝、由誰拍攝、以及照片原來的用途，因為這都有可能影響照片所說明的事實。在歷史檔案館的網頁上的照片，一般都有標明照片

的來源、年份和原來編號等，這些資料可讓我們在研究該批照片時對照片的拍攝背景有基本的理解。我們在利用該批照片時，亦可嘗試配合其他檔案或資料，以便更能理解照片所呈現的是一個怎樣的「過去」。

註釋：

¹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在 2002 年 8 月至 2003 年 1 月期間，曾就本館部份館藏照片進行研究，並撰寫及翻譯照片說明。有關照片及說明已存放於本館網頁，供公眾查閱。本文在撰寫期間，得蒙主持上述研究計劃的潘淑華博士提供資料及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² 順帶一提，除了照片外，部份影片、地圖、圖則、海報等視像資料亦自 2002 年 10 月開始可在檔案館網頁上瀏覽。

2003 年華南研究年會會議通告

舉行日期：2003 年 12 月 20-21 日

地點：中山大學

截止報名日期：2003 年 8 月 31 日

報名及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傳真(852)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華南研究年會由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和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業委員會合辦。華南研究年會自 1996 年開始，每年皆在 12 月中、下旬舉行。年會鼓勵通過跨學科的研究，以地區研究作為起點，結合文獻分析和田野工作，推動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發展。

2003 年的華南研究年會將於 12 月 20-21 日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歡迎各研究人員、研究生和有興趣者報名參加。有意參加者請於本年 8 月 31 日前以電郵方式把約三百字的論文摘要寄交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轉給年會。

華南研究年會採用專題小組(panel session)報告形式。年會歡迎參加者自組專題小組，專題小組負責人請提交專題小組題目、專題小組的主題摘要及各論文摘要、專題小組內各報告人的相關資料及評論人名字。個別報告者由年會安排報告組別。報名表格請於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網址(<http://home.ust.hk/~scenter/>)下載。

年會採用不記名評審制度審核提交的論文摘要。評審結果將會在 10 月 1 日前寄回各組別負責人或個別報名者，並於 10 月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中刊登參加年會者之報告組別和論文摘要。

入選之研究生報告者可以申請資助交通及住宿費用(往返的火車硬臥車票或飛機票和與會期間的住宿費)。各報告文章歡迎投稿《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或《歷史人類學學刊》。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六期)

研討班每年舉辦二至三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第六次研討班

日期：2003年10月11-12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一) 論文報告人

資格：

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本人學位論文。

報名辦法：

請於2003年9月19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劉志偉教授收。電郵地址：hsslzw@zsu.edu.cn；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馬木池先生收。電郵地址：hmmcma@ust.hk。主辦機構將於9月26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日期。

提綱需包括以下各項：

1. 學位論文題目；2. 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 論文各章節簡介；4. 參考書目。

費用：

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汽車)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二) 參加研討班討論

資格：

碩士或博士各級研究生

報名辦法：

請於2003年9月19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電郵送hsslzw@zsu.edu.cn及hmmcma@ust.hk。

費用：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在廣州食宿費用由主辦機構負責。

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日期：2003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

地點：廣東省潮州市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2003 年 8 月 28 日

講座系列之十

時間：9:30-11:15

題目：從地方史到區域史——潮學研究的課題與方法

講者：陳春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講座系列之十一

時間：11:30-13:15

題目：區域研究與國際視野——潮洲、香港與東南亞

講者：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座系列之十二

時間：14:30-16:15

題目：民間傳說與區域社會史研究——以華北為例

講者：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講座系列之十三

時間：16:30-18:15

題目：區域研究中碑刻資料的收集與利用

講者：鄭振滿（廈門大學歷史系）

2003 年 8 月 29 日

講座系列之十四

時間：9:00-10:45

題目：民間宗教展現的地方與國家
講者：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座系列之十五

時間：11:00-12:45

題目：從京族跨國聯繫與苗族的身份建構看邊界的多重意義

講者：張兆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座系列之十六

時間：14:00-15:45

題目：走進民間的國家典章制度——閱讀地方文獻

講者：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系）

講座系列之十七

時間：16:00-17:45

題目：祖先拜祭與地方組織——華南華北的比較

講者：科大衛（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

合辦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查詢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電話：86-20-84114832 傳真：86-20-84113308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_更改地址

___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三十二期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華南研究會 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黃永豪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c/o Humanities Divis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enter>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印製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馬木池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